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研究

专 业: 建筑历史及理论

硕 士 生: 何 畅

指导老师: 杨豪中 教授

摘 要

最早在四川建筑的近代外国建筑是天主教堂,对川南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的研究揭示了西方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在宜宾教区的传播,为我们研究东西方建筑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对研究川南宜宾教区近代建筑的演变亦也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对川南宜宾教区的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状况、分布特点、建筑造型风格特点和建筑成就作了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由此展示出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作为西方建筑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一教区的发展和演变,产生出丰富多样的建筑形态,成为宜宾教区近代建筑文化遗产中具有相当价值的组成部分。作者实地调查了宜宾教区现存的全部天主教堂,收集一手资料,对其进行了分析,对比和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天主教堂作为近代宜宾地区最早出现的欧洲建筑类型,仍然保留着西方教堂的痕迹。由于具体的地理位置、特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地方传统紧密相连,近代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突破了原有的欧洲教堂模式,逐步地将地方传统建筑形式融入教堂建筑模式中,发展演变为独特的、中西合璧的地方教堂型制。

近代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经历了礼仪之争、欧洲政教分离和地方社会复杂纷繁的历史变化,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中西文化交流导致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变化的不稳定性,最终未能形成相对成熟的新的建筑形式,而只能停滞在朴素的折衷主义状态。

这些教堂建筑的出现,丰富了我国的建筑历史和文化和城市景观。作为多元建筑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建筑应该得到合理的关注和保护。

关键词: 宜宾教区, 近代天主教堂, 建筑风格

Study on Catholic Church Building in Yibin Diocese of Modern Times

Specialized: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Instructor: Prof. Yang Haozhong

Graduate Student: He Chang

Abstract

Catholic Church building is the earliest modern foreign building in Sichuan. It has especial value to study catholic churches of Yibin diocese. It helps us to research west culture spread and commun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in Yibin diocese. And let us know, the flexibility, the freedom to absorb and to adapt that is so much a part of the folk tradition of southern Sichuan.

The article deals with catholic churches in Yibin diocese built of southern Sichuan from mid-19th century on, including its histor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development process, locations, building styles and art achievement ,especially its creative treatments, in Western-Chinese style combination. Systematical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reveal that modern Catholic Church in Yibin diocese in 19 and early 20 centuries, as a part of western architectural culture, developed and changed to yield a variety of architectural form and to become a valuable part of Yibin diocese cultural legacy. The authoress focuses her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on the main catholic churches, doing typological analysis, making appraisal of their valve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m, then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Catholic churches, as the earliest Europe architecture in Yibin diocese, breached the intrinsic Europe church mode and gradually blended the formats of locality tradition architecture into the new religion architecture. The catholic churches worked up to the east and the west combining, and appeared a special architecture type.

Catholic church of Yibin diocese came through a series of events, such as the argument about comity, the Close Police and so on. So Catholic church of Yibin diocese still stagnated in the step of simple eclecticism and could not form relatively mature architecture format.

These catholic church buildings make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richer and beautify landscape of cities. As a part of cultural legacy, these buildings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maintained.

Keyword: Yibin diocese, modern catholic church, building style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本人或其他人在其它单位已申请学位或为其它用途使用过的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所有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致谢。

申请学位论文与资料若有不实之处,本人承担一切相关责任。

论文作者签名: 何仰

日期: 2006.6.19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保密的论文在论文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 何仰

导师签名: 李红

日期: 2006.6.19

注: 请将此页附在论文首页。

1 绪论

1.1 研究的内容

1840年—1949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特殊时段，它是中国建筑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期。本文对这一时期不同形式的天主教堂进行分析归纳，并从其宗教文化背景和建筑形制特色以及与川南地区乡土建筑的相互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揭示川南宜宾教区天主教堂所体现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文化性。借此向人们展现现代科技在中国应用前，欧洲古典建筑是如何与地方社会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相适应，是以什么形象出现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地区，从近代建筑的历史变化中，体验两种文化交融的最终实现所经历的艰辛。

主要内容结构：

(1) 绪论。明确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内容、研究目的和意义和研究采用的方法。

(2) 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背景及在宜宾教区的传播概况。主要介绍近代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背景和近代天主教在宜宾教区的传播概况。

(3)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分布和发展状况。主要介绍天主教在宜宾的分布和近代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发展的历史沿革。

(4)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总体风格特征的介绍。

(5)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的概况和特点。从教堂建筑的选址、群体的组合、立面造型、平面布置、空间组织和内外装饰等方面分析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的基本特征。

(6)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重点个例剖析。从教堂建筑的选址、群体的组合、立面造型、平面布置、空间组织和内外装饰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7)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艺术成就及提出对它们的保护。

1.2 研究的目的是和意义

教堂建筑在西方建筑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形成了固有传统建筑和新建筑两大体系并存的局面，呈现出中西交汇、新旧接替的时代特征。新建筑体系不是在中国的传统建筑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自然孕育而生，而是从西方国家直接传来的。中国建筑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突变，这种突变始之由传统的木结构，直接转变为具备近代建筑技术、近代建筑类型、近代建筑功能、近代建筑形式的新建筑体系。从建筑的发展趋势来看，其中新建筑体系显然是中国近代建筑活动的主流，它是中国近代时期建筑发展的新事物，也

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新的建筑体系中，西方宗教建筑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天主教的教堂建筑，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地位极其重要。

《四川志·建筑志》中写到：“最早在四川建筑的近代建筑是天主教堂”。宜宾教区天主教堂主要是清末欧洲天主教组织传入的一种建筑形式，其独特的建筑形式有别于西方教堂与当地传统建筑，又与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明显关系。宜宾教区天主教堂之所以具有特殊性，是因为它是以西方的古典文化为基础的教堂建筑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乡土建筑的结合，它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意识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前的中西古老文化短暂交流的历史产物。

本文分析教堂建筑形式的内在规律或特点，通过研究近代教堂建筑的发展过程中观念和形式变迁，指出西方教堂建筑在中国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提供科学与艺术的经验和哲理。

本论文以宜宾教区的天主教堂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近代川南宜宾教区的天主教堂的研究，挖掘出其鲜明的地方特色，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认识；同时，对这些建筑的近代建筑技术、建筑类型、建筑功能、建筑形式等方面的影响有深刻的了解；在弥补这项研究空白的同时，也为宜宾教区的宗教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一份资料。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尤其在欧洲，天主教堂建筑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建筑类型，相关资料比较多。在目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多以沿海城市和最早开埠的一些主流城市的教堂建筑为研究对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传教士进入四川腹地，在清廷的“保教”政策下，天主教会势力不断扩张，逐渐成为四川外国教会势力的重要力量。四川教区分为三大教区：川东教区、宜宾教区和川西北教区。天主教会在宜宾的活动史，是四川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史家却论之甚少，且多不详。

1.4 课题研究的组织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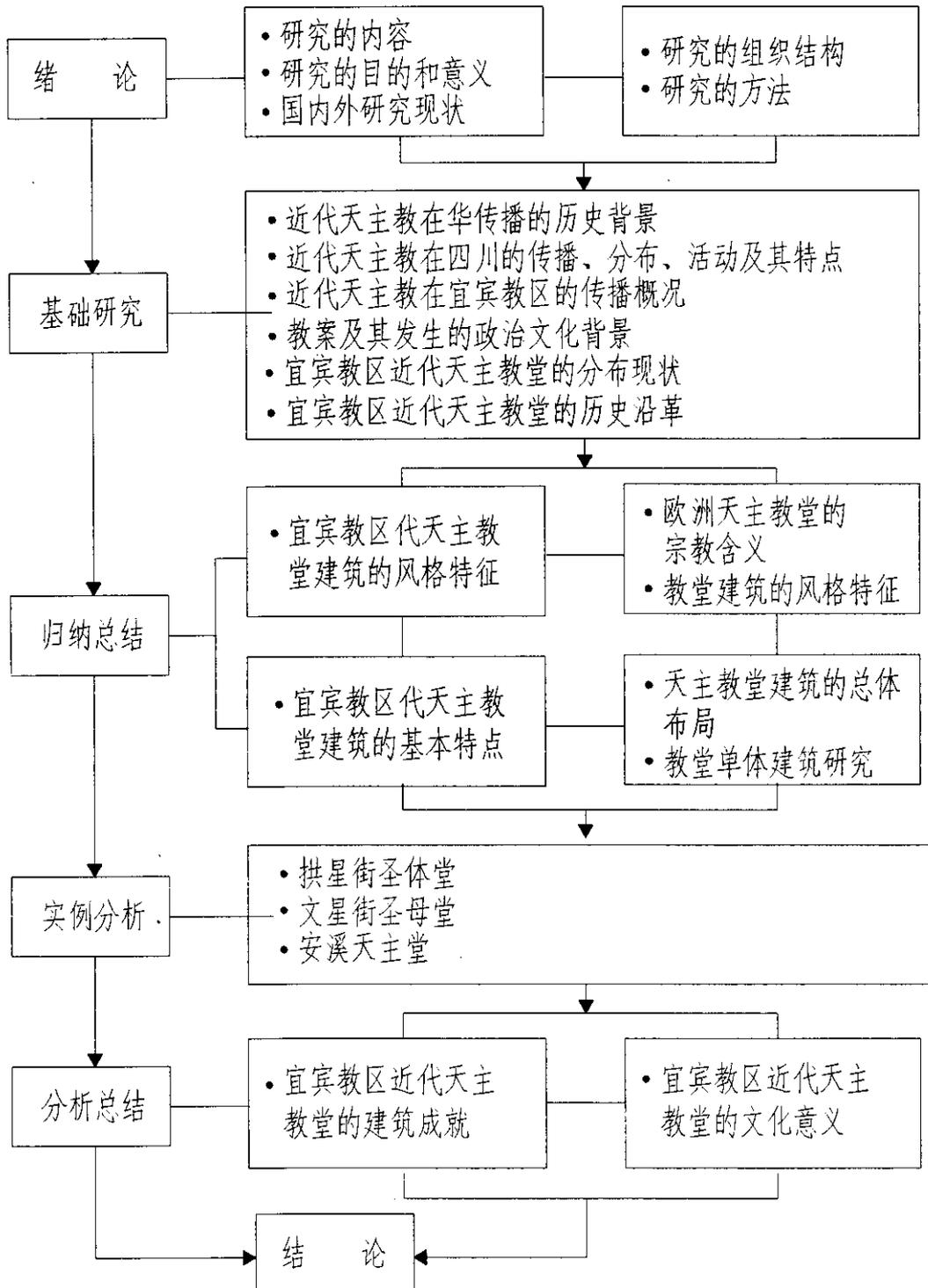


图 1.1 课题研究组织结构图

1.5 研究的方法

本文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通过阐明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史实,研究、分析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总体上考察在建筑变化过程中,各种历史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这些因素的调整、融汇。根据各种文献资料,剖析诸多因素对天主教堂建筑的影响。

本课题在掌握了相关背景资料的条件下,对其进行实地调研、测绘,尽量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对相关教堂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川南地区教堂建筑过程中,明确西方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地方内部因素在教堂建筑变迁中所起的作用,分析教堂建筑演变过程,从而进一步分析其对近代建筑的影响。天主教传入宜宾教区后,中西文化的碰撞,一方面教堂建筑受地方传统建筑风格、营造技术和取材用料经验等影响,改变原有形象,另一方面传教士的到来对当地的社会、文化、政治产生一定震动。所以通过详细调查现存的宜宾教区教堂的形制式样、结构手法、细部装饰等,可以直观地描绘现存的宜宾教区天主教教堂建筑形式,发掘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的基本特征和独特风格,及其对宜宾教区近代建筑发展的影响,确定其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

2 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背景及在宜宾教区的传播概况

2.1 近代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背景

天主教^[1]是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传教士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 13 世纪的元朝。16 世纪,天主教第二次传入中国。1840 年,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潜藏的传教士中依靠外国侵略势力公开传教的第一位是罗马教廷传信部派遣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家院的罗类思,1840 年,教皇任命罗类思为“南京主教”,他长期潜藏在浦东的金家巷。1846 年,罗类思和来到上海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决定要求上海地方官先发还上海城内天主堂和旧教产”^[2],他们得到英国领事阿礼国等的支持和大力帮助,终于使上海地方官用董家渡、洋泾浜、石皮弄的三块土地作为赔偿。在董家渡的一块地上罗类思和他的继承人、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赵方济修建了从天主教传入到那时为止在中国最大的第一座天主堂。孟振生是法国遣使会会士,是一直潜藏的传教士,罗马教皇于 1840 年任命他为“蒙古地面之主教”,两年后任命他为“代管北京之主教”,1856 年又任命为“北京主教”。但他一直无法进入北京,在北京之外半公开传教。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传教士传教的范围只限于几个通商口岸,内地是不允许进入的。法国传教士马赖于 1852 年擅自进入广西西林,四年后被发现,受到清政府的严厉处罚。法国以此事为理由,英国以“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联合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 年英法侵略军把战火烧到北京时,传教士董若翰在上海,他得到法侵略军司令孟斗班要他去北京的消息,即从上海到天津,并派人把此消息送至孟振生,孟从潜藏地也到了天津,10 月 23 日他俩来到了北京。孟振生、董若翰到北京后,法国全权大臣葛罗向恭亲王奕訢提出了归还南堂的要求,得“允其所请”。南堂交给董振生后,葛罗又很快使北堂、东堂、西堂成了孟振生管辖的天主教堂西堂成了孟振生管辖的天主教堂。继上海之后,北京的天主堂重新有了法国遣使会的传教士。传教士艾嘉略是葛罗的翻译,中法《北京条约》中文约本第六款“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法文约本是没有的,是艾嘉略私自加进的。中法《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的签署,为法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铺平了道路。

1861 年至 1866 年,德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在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都列入了保护传教士传教的条文。于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公开传教。如 1865 年,成立才三年的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宁夏一带建立教徒村;1879 年,西班牙传教士重返河南;1882 年德国圣言会传教士

开始在山东传教。到 19 世纪末,天主教教徒已发展到 70 万人之多。在此期间,由于外国教会势力欺压百姓,引起教案此起彼伏,酿成了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1900 年后,罗马教廷改变传教策略,利用赔款在华兴办学校(如北京辅仁、上海震旦、天津工商三所天主教大学)、医院(如上海广慈医院)、慈善事业等,扩大了社会影响,得到了社会的好评。到 1918 年中国天主教徒已发展到 200 万之多。

国民党统治时期,允许罗马教廷将中国天主教划分为 20 个教省和 130 多个教区,同意教省总主教、教区主教多由西方传教士担任,掌管一切大权。到 1949 年解放前夕,天主教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信教人数已达到 300 多万。

2.2 近代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分布、活动及其特点

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开始在四川建立主教区^[3], 统管西南三省的教务。据天主教川南教区的法文档案记载,管理四川主教区的有两个主教,一个是冯达拉主教(1838 年亡故),一个是他的助理贝罗书主教。同时,还有 9 位传教士、23 个本地教士和 30 个讲授助理者协助他们。据 1837 年的统计,两个主教管辖的整个教区的教徒已增至五万人。1840 年 8 月 28 日,云南完全脱离四川,自建立教区。鸦片战争后,天主教重在四川设立教区,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4]。1843 年 6 月 12 日,贝罗书主教在重庆举行加冕礼,“他只有一两个本地教士的协助”。1846 年 3 月 27 日,贵州脱离四川,建立主教区。同年,原附属于印度亚格那主教区的西藏教区,由其主教波尔基委托给四川教区进行“福音教化”。

在这一时期,法国强迫中国订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条约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严惩。”^[5] 这样,清政府由此承担了保护天主教堂和传教士的义务,鸦片战争前对天主教的禁令也被迫取消。天主教在川活动渐趋活跃。传教士无视条约中“概不准赴内地传教”的规定,在四川公开违约活动。据教廷传信部报告,仅 1848 年一年间四川省受洗入教者,即有成人 880 余人,病危儿童 8.4 万余人。^[6]

教徒不断增多,教务日趋繁重,对四川本部教区进行划分已很有必要。1854 年天主教传教士就已开始研究教区划分问题。1856 年 4 月 2 日,天主教会就四川本部教区进行了第一次划分,设立了两个主教区,即四川西北区和四川东南区,分别以成都和重庆作为主教驻扎之所,同时继续管辖西藏教区。这三个教区先后由贝罗书主教、德弗来什主教和德斯马曾神父主持。1857 年 8 月 9 日,三主教经协商,同意三个主教区的划分界限。1858 年 1 月 1 日,罗马力批准了他们的协定。三个主教区的界限是:川西北教区包括四川省的整个西北部,还附加南方的两部分地区,第一部分是邓州、大邑县、木坪、天全州的东部地区,第二部分是资州、内江和资阳,川东南教区包括四川省的整个东部以及属于下川南南部的一半地区;

西藏教区负责上川南南郡地区的一半,包括仁寿和井研两个县。^[7]这样划分后,川西北教区的教徒约有二万九千人,川东南教区约有二万一千人,西藏教区约有一万九千人。

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法国取得了天主教传教士入内地自由传教、各通商口岸任意租地盖房、设立教堂的权利。条约规定,“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法国由此取得了在华天主教的保护权。^[8]两年后,《中法北京条约》又规定清政府须赔还以前没收的法国在华的天主教产。同时,法国教士在中文约本上私自增加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等字样,非法谋取了一些新的特权。

这样,天主教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获自由布教之权,……滔滔汨汨故杂然入支那内地”^[9]。在这一时期进入四川的法国传教士每人都带着一份法国公使颁发的护照,上云:“自此某公,在四川省来去传教居住,无论何处租买田地、建造天主堂屋宇,均听其便,丝毫不可留难,当以宾礼相待,并望随时照料。”为此,无论是“大清国的执政大臣”,还是“各省文武官员、边疆大吏”,“凡属大清国辖内外各处,都必须遵照勿违”。^[10]所以,保护教士传教,成了四川官员的重要洋务之一。四川为此设立了洋务局,专办洋人出入境“拨派兵役护送”之事。

1863年重庆教案,1865、1868年两次酉阳教案的爆发,使在川天主教会势力受到打击。中法战争后,天主教会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1883年,全省有24个州县建立了天主教堂,到1892年,全川有天主堂161座、布道室1239处。^[9]据重庆海关统计,1901年法国在川传教上有124人,教徒多达93823人,拥有教堂221所。^[11]1907年出版的《四川》杂志载有一文,称:“据日人神田正雄之调查,谓该教(指天主教)在四川现存教徒五十五万人”。四川天主教会势力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

天主教传教士在四川的活动范围很广,以成渝两地为中心,天主教会势力还逐渐深入到川边地区。即使在川边笃信佛教的藏族居住区,也到处有十字架的踪迹。清末打箭炉同知李之珂说:“外人窥探边荒,籍口传教,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12]

2.3 近代天主教在宜宾教区的传播概况

外国教会势力进入四川,以天主教势力为最早,据民国《巴县志》,其时约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教会最初传教点大致在川东重庆府属的巴县城内。自1840年起,四川主教区开始建立,初包括云、贵、川三省。1840、1846年云贵教区分别成立;在四川境内,1856年4月则第一次划分为川西北、川东南两大主教区。

在清政府公开的“保教”政策下，天主教来川教士日益增多，天主教会势力在四川得到进一步发展。1860年7月1日，宜宾教区从川东南教区划出，初名川南教区，后又分为西昌、乐山、宜宾等三个教区。宜宾教区辖宜宾及自贡、泸州两市及其下属县、乡地方。^[13]该教区由德弗来什主教的皮松神甫主持。其管辖范围包括上南道(雅州府、邓州、眉州、嘉定府和宁远府)、下南道(资州、叙州府、庐州和叙永厅)，计9个府直隶州、51个厅州县。但事实上川南教区的界线一直延伸到西藏本部的边界；在1861年与1868年中，川南教区又占有了打箭炉。该教区在1861年拥有天主教徒近1.2万人、大小教堂及祈祷所4处、宗教团体8822个。到1880年则分别增至19937人、32处、9068个。由此，四川天主教会重新分成三个主教区：川东、川西北和川南主教区（法国于1865年被迫放弃了西藏教区），分别由三位主教经理。^[14]本文研究的对象就是川南的宜宾教区。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清康熙五十年左右（约1711年前后）已来宜宾传教。据旧志记载和叙永天主教神甫讲述：天主教传播路线是由重庆逆长江至宜宾，再从陆路到屏山、荡连、古宋、叙永等地。清咸丰十年（1860年）天主教正式在川南设教区，叙永城为教区总堂所在地，重庆的德弗米什主教专为皮松神甫举行加冕礼并派其主持川南教区事务。1864年川南教区已有天主教徒17万人左右，布教点200余个，皮松主教不无得意地说：“我的教区与四川另两个教区（川东、川西教区）比较，面积上同样宽广，人口也差不多一样。”天主教势力也向区乡扩展，距叙永城30里的大树区及距城120里的分水区等都建有分堂，《叙永县志》记载：“同治年间，信者众增，除汉民外苗民亦信之。”经过传教士的不断渗透，到二十世纪初，天主教会在四川取得了绝对优势。川南教区德米赛在写给法国驻北京公使的报告中得意地宣称，“有一百多法国教士和法国国民，十多万教徒和官方顾主遍于（四川）整个区域”。（表2.1）

清同治十一年（1827年）起以叙府（今宜宾市）为中心的天主教川南教区，先后派法籍传教士穆若德、沙波特、白热特、布瓦索、摩莱特、维莱等人到普江寿安地区传教。天主教于清康熙年间（1662年—1772年）由法国人传入纳溪。最早信奉者有童、丁、袁、李、王诸姓，他们多是从湖广入川的“根教”，即全家信奉，子孙相沿成习。^[15]至清末明初，全县有教徒约1500人。历任神父均为巴黎传教会派来，持有清政府发给的“钦差传教士”文书，在本地享有特权。民国16年（1927年）后，改由经过神学院培训的中国神职人员担任神父。1800年左右，天主教传入泸州，传教士初来时人数很少，为避免清政府对洋教的查禁，传教士多是隐蔽的，当时教务发展比较缓慢。自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庚子赔款后，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来华多了，而且还受到清朝官吏保护，传教士身份公开化。他们勾结官府，欺压华人，在山东等地引起仇洋

排教斗争。在泸州，教会兴办一些慈善事业和学校，寓传教于善举，有利于劝人入教，缓和矛盾。故而信徒日益增多，分布地为之扩大。

表 2.1 1875-1910 年川南教区传教士和天主教徒数统计表

年代	传教士人数			教徒数
	外国	中国	小计	
1875	18	9	27	14749
1880	23	9	32	19937
1885	23	9	32	16516
1890	31	10	41	17176
1895	37	10	47	19097
1900	37	10	47	19692
1905	47	13	60	24869
1910	40	15	55	30618

同治九年（1870年）始兴建都长街“永生公馆”（今市信访办、文联地址），曾向富裕教徒“佑盛号”吕家、“天成堂”陈家、“万和老窖”张家借贷。于光绪元年（1875年）建成，命名为“大法国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川南教区主教公署”（永生公馆）。以后，从光绪四年至二十五年（1879—1899年）川南教区从四川、宜宾发生的几次教案中掠取了赔款纹银百余万两，以其中50万两在川南各地购买田土9000多石，街房800余间。另抽出部分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1897年—1900年）在草市上修建了天主堂，即今拱星街30号天主堂。

2.4 教案及其发生的政治文化背景

西方国家用大炮撞开大清国门以后，四川人民最先接触到的便是蜂拥而来的传教士及遍布城乡各地的教堂。由于传教士的侵略特质以及四川社会自身的特色，从而导致出一系列民教冲突。当时四川社会的情形可以这样说：“上自政府，下至州县，兢兢然日惧其有而不能必其无有者，教案也。各国近年以来，视耽欲逐所藉以于中国土宇之内扩张其势力，而不虑其不得志者，亦教案也”^[16]。其时四川此伏彼起的教案，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后果之严重、社会影响之巨，均属全国罕见。纵观19世纪末叶的四川，我们可以看到，反洋教斗争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一种全民性的社会运动。社会各阶层人们在事实上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反洋教联合阵线，形成了一呼百应的浩大声势。其中重要者如1863年的重庆教案，1865年、1869年的两次酉阳教案，1873年的巴塘教案，1873-1875年的黔江教案，1875年的南充教案，1875年的营山教案，1876年的邻水教案，1875-1876年的内江教案，1876年的江北厅教案，1886年的涪州案，1886

年的重庆教案，1886年的大足教案，1886年的铜梁教案，1890-1891年的大足教案，1895年的成都教案，1895年在乐山、眉山、宜宾、雅安、灌县、间中、泸州、大邑、冕宁、新津、西康、单州等地相继发生的教案。

促成近代四川这种全民性的反洋教运动频发的主要原因大体可归纳为：

一、传教士强行建堂传教，任意索要害之区建教堂，且将教堂修得宏伟、壮观，高过当地庙堂，人们认为有损神威，有伤地脉风化；疑惧其侵略之心，故争执、阻挠，由此冲突而起。

二、因迷信与误解，认为传教士设育婴堂，是为挖眼剖心，熬制洋药；同时，对传教士所宣传的教义深为反感，认为是冒犯神灵，大逆不道。

三、传教活动的侵略特质，严重损害了各阶层人们的权益。教徒、教士素质都极差，教士中“高僧”形象已微乎其微，时人论道：“传教之士，非有利玛窦之学识也，奉教之徒，非有徐光启之才技也……盖教士之中，非无热心传教之士，然西国无业游民亦多借传教以求衣食；教民之中，亦非无一二博通之士，然内地之人教者，又皆游手无赖之徒，以入教之名，以达其作奸犯科之故”^[17]。

表 2.2 川南教案统计统计表

府州厅	教案次数
叙州府	8
泸州	2
叙永州	1

2.5 小结

天主教自元朝第一次传入中国，在中国有很长的传播历史。传入初期，历史也可谓源远流长。在传播初期，以利马窦为首的传教士为了使天主教在中国的朝廷和老百姓中有更大的吸引力，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学习研究，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良好的开端和比较稳固的依靠。

清康熙三十五（1696年）年传入四川，1956年4月将四川教区分为川西北和川东南两个教区，1960年从川东南教区划出川南宜宾教区，从天主教入川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教会恣意欺压百姓和多方的因素发生过多次教案。

本章注释：

[1] 天主教是与东正教、新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宗教派别之一，亦称公教。“天主教”中文名称，是明末来我国宣布福音的传教士所拟定。它原来的名称是“基督宗教”，是指耶稣基督所创立的教会。后因时代的变迁出现信仰态度不同的

基督宗教东正教、基督教的各教派，统统称为“基督徒”。天主教乃建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上，它的前身是犹太教。他最初仅在犹太人中宣讲天国福音，教导世人敬天爱人，走真理的道路而进入永生。耶稣升天后，他所拣选的以伯铎为首的使徒，立刻展开传教工作，从犹太到小亚细亚，传到当时的罗马帝国各地，并在各地建立教会，而使福音传布到普世人类。由于基督徒的神信仰，和宣扬的平等博爱，为当时的统治者罗马帝国所不容，屡遭种种迫害，无数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为基督信仰作证。公元 312 年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了天主教。次年与东罗马皇帝联合颁布“米尔诏书”，准许信仰自由，迫害才告终止。君士坦丁大帝统一了东西罗马，使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是为罗马政教合一的开始。1054 年，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脱离罗马教宗，成立东正教。1521 年神父马丁路得脱离天主教，成立新教，之后又有其它与天主教分离的教派产生（我国通称基督教）。东正教除了不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权以外，信仰上与天主教并无根本差别。

- [2] 向杨.《中国宗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995.第 54 页
- [3] 教区是特定地区天主子民的集合体，是教会的基本单位，托付给主教在司铎们...的协助下所牧养。教区之下应分为总铎区和堂区，作为固定的信友团体，可说是教区的细胞。
- [4] 杨真.《基督教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79.第 64 页
- [5]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62 页
- [6] 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Missions in China》.第 293 页
- [7] 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 8-19 页
- [8] 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Missions in China》.第 306 页
- [9]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126 页
- [10] 四川省档案馆编.《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献县天主堂 1937 年版.第 32 页
- [11] 《新设炉霍电志略》附录.《上赵次帅条陈》
- [12] 李熙亭.《四川天主教史料汇编》.内部资料.1985.第 98 页
- [13] 泸州市天主教教史编写组.《泸州天主教历史概况》.2005.第 104 页~第 162 页
- [14] 李熙亭.《四川天主教史料汇编——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史料》.内部资料.1985.第 7 页
- [15] 纳溪县县志编写组.《纳溪县志》.1995.第 546 页
- [16] 《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10 期.第 51 页
- [17] 《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10 期.第 51—56 页

3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分布和发展状况

3.1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分布现状

历史上天主教曾深入四川地区传教，教堂遍布城市和乡村。虽经历过多次反洋教运动和教案的破坏，但由于教会的修复、重建工作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政府对宗教活动场所的保护，保存下来的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还有 7 个，其中有的还被列为市级或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另外还有解放后新建的教堂 3 个(自贡市天主教堂、荣县天主教堂、南溪天主堂)以及临时教堂 1 个(富顺城区天主堂)。(见图 3.1、表 3.2、图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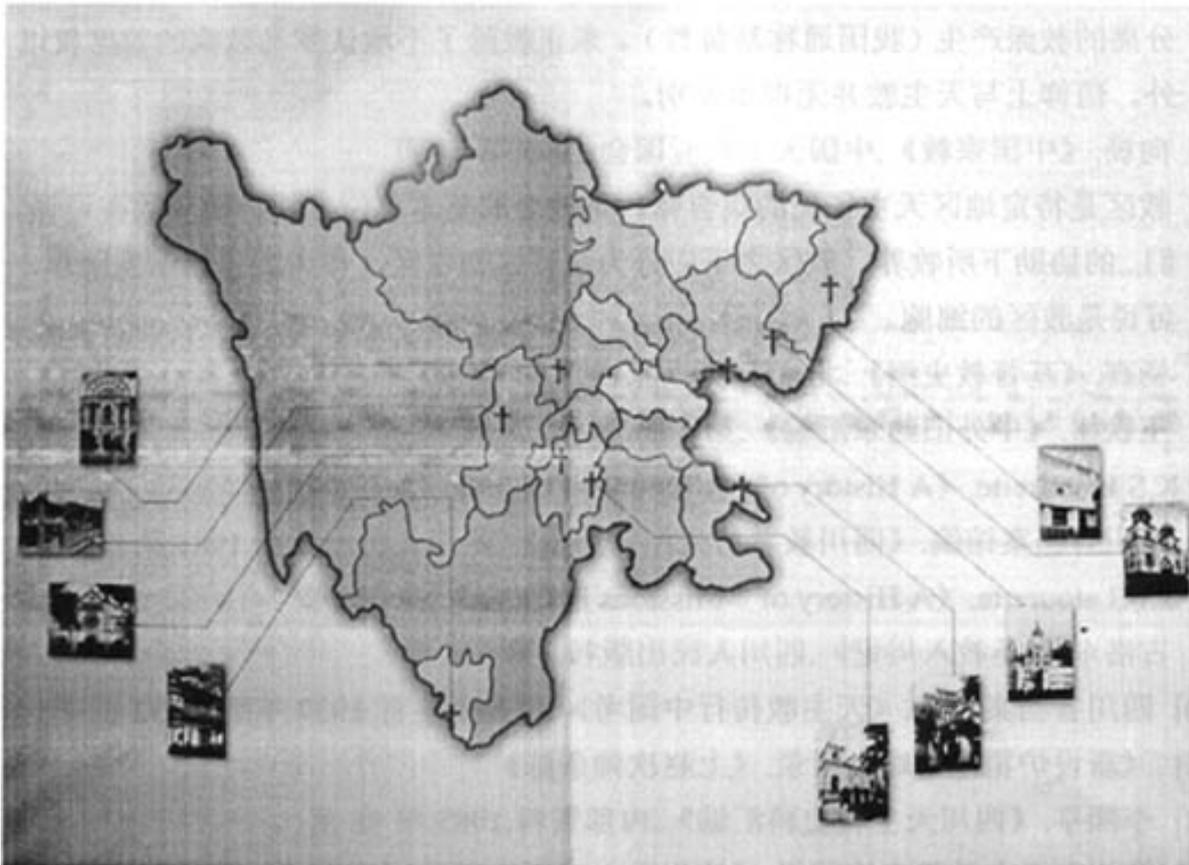


图 3.1 四川省天主教堂分布图

3.1.1 位于城镇

由于城镇历来都是人口和经济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所以教会把传教力量重点放在城镇，并希望以此在社会上扩大其影响，企图使天主教在城市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在现存的 7 个近代天主教堂中，有 4 个处在繁华的闹市区或邻近

市中心的地方，它们分别是：宜宾市圣母堂、宜宾市天主堂、泸州市真原堂、纳溪天主堂。

3.1.2 位于乡村

由于我国的农村面积和农村人口在全国占有很大比重，所以教会也没有忽视天主教在农村的传播。保存至今的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有3个位于远离市区的农村，他们分别是：安溪天主堂、长宁天主堂、江安天主堂。在远离市区的农村还有多处教堂因为没有保护，已经被破坏或拆除。

天主教在乡村广泛传播的原因主要如下：

川南山区“土壤晓薄，荆棘遍野，峭岩深阻，道路崎岖”^[1]，山区粮食作物以玉米、荞子、高粱、大麦、洋芋、豆类为主在风化剥蚀的土壤上，耕作粗放，自给明显不足。农民无力抵御自然灾害和阶级压迫，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天主教公开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从而给饱受煎熬的农民以慰藉。许多农民在沉重苦难的枷锁下生活了一辈子，憧憬着死后的幸福天堂，天主教的理论为苦难的人们安排了来世享受极乐的说教，使他们逐渐乐于接受天主教。

表 3.2 现存的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

序号	教堂名称	建造年代	建造人	地址
1	拱星街圣体堂	1897年	法国神父	四川宜宾市翠屏区拱星街35号
2	文星街圣母堂	1898年	法国神父	四川宜宾市翠屏区文星街55号
3	江安天主堂	1915年	法国神父	四川省江安县
4	泸州市真原堂	1880年	明神父(法)	四川省泸州市新马路123号
5	纳溪天主堂	清咸丰年间	艾查雷利神父(法)	四川省纳溪县护国镇
6	双河天主堂	1900年	法国神父	四川省长宁县双河镇
7	安溪天主堂	1859年	法国神父	四川省富顺县安溪镇

总的来说，由于城市拥有比乡村更为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所以位于城镇的教堂保存得比较完整，也更加有欧洲天主教堂的特色，乡村的天主教堂多采用当地民居形式，且由于乡村的教堂建筑保护不到位，很多教堂在文革或是教案中被毁坏或者是被占用改作其他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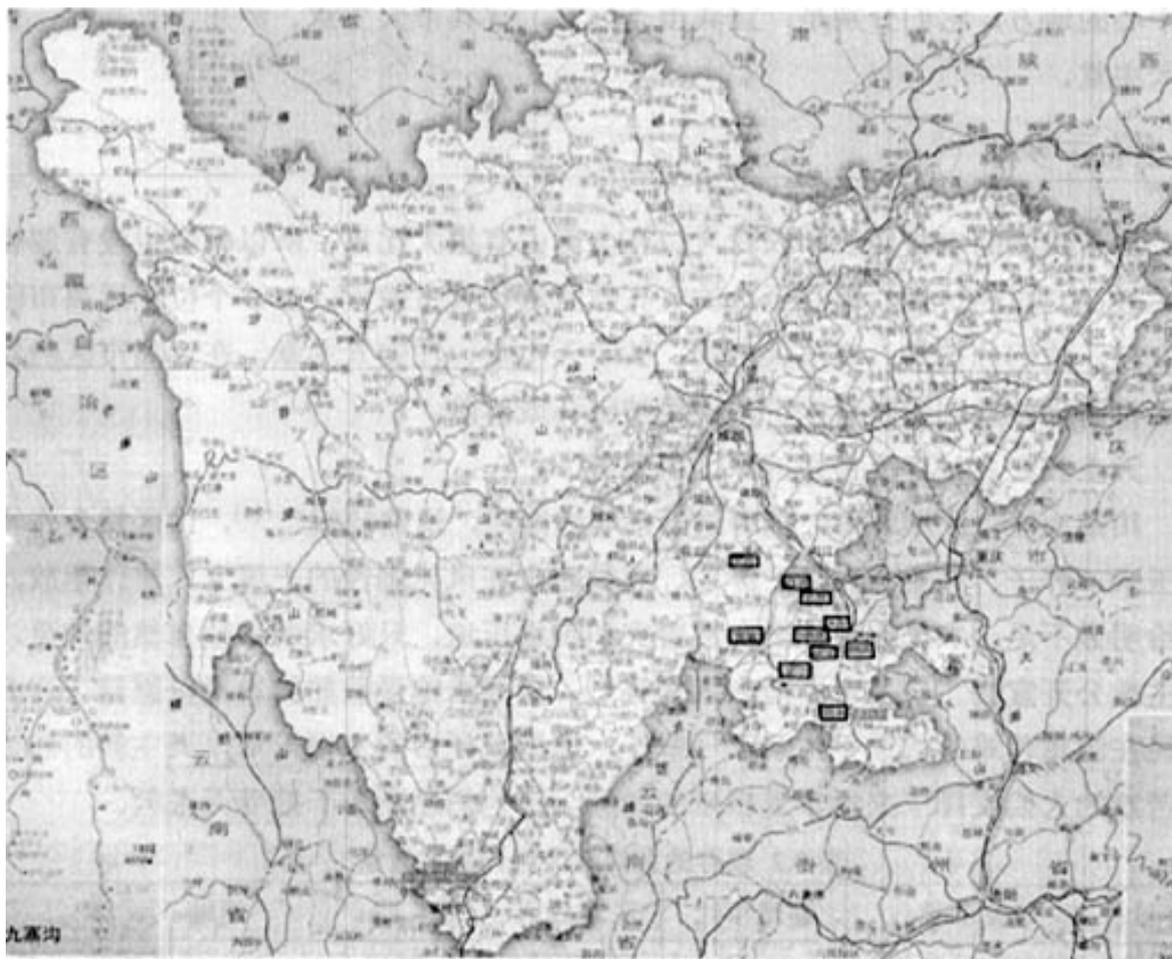


图 3.3 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的分布现状

(注：图中画方框的地区都有天主教堂)

3.2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历史沿革

3.2.1 宜宾

同治九年（1870年）始兴建都长街“永生公馆”（今市信访办、文联地址），曾向富裕教徒“佑盛号”吕家、“天成堂”陈家、“万和老窖”张家借贷。于光绪元年（1875年）建成，命名为“大法国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川南教区主教公署”（永生公馆）。以后，从光绪四年至二十五年（1879—1899年）川南教区从四川、宜宾发生的几次教案中掠取了赔款纹银百余万两，以其中50万两在川南各地购买田土9000多石，街房800余间。另抽出部分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1897年—1900年）在草市上修建了天主堂，即今拱星街30号天主堂。光绪二十七年（1898年—1905年），将始建于光绪初年的一处教堂改建成宜宾市文星街圣母堂。

法国传教士于咸丰三年开创江安县天主教，最初在大渡口，以当地肖玉隆为首创立“真原会”，后与李万有集资，购买铺房一间作为会所。光绪初年又购买

另一宅院，更名“真原堂”，后又改名为“天主堂”，属宜宾教区管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县城桂香街修建“天主堂”，历时三年建成，总堂由大渡口迁往县城。清朝末年，法国神父劳崇德调到江安，至民国初年，先后建立了滥坝（滥泥沟）、三重堂、桐梓（骑龙坳）、流耕四个支堂，当时军阀混战，盗匪横行，乡下教友多来教堂避难，教徒发展很快。光绪二十四年，古宋人刘昆阳率众捣毁了大渡口天主堂。请政府调官兵达字营镇压，将刘擒获拿至泸州斩杀，清政府赔款白银二万余两，教会用于买田产、修教堂、置街房、修义园（埋葬教友的地方）。鼎盛时期教会拥有田租九百余石，由宜宾教区同统管。教会办有男学堂、女学堂、医院等。

自孟神父来大渡口传教起，江安县天主教共经历了法国神父十四人（多数只带其姓）即：孟、严、宋、方、何理白、何、汤、劳崇德、邓、吕本笃、游文翰、吴、吕茂林、吕崇华。中国神父有：杨、李、陈宜、葛离、何崇尧、陈竹、李灿如、陈宣明、渝汝言、王希宁、陈先华、欧春渝、杨会强、蒋宝良等十四人。

3.2.2 自贡

清光绪年间，自贡市富顺县就建立了教堂，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法籍蔡神父将总堂迁到富顺县石灰溪（今安溪镇），修建了教堂。1935年，宜宾教区派神父李灿儒到富顺城西门文庙侧成立天主教堂，原为安溪天主堂分堂，没有设神父，每半年由主堂神父前来主持宗教活动，1935年起脱离安溪管辖。后因入教者较多，数年后在城内“读易峒”对面购屋一座，经堂随即迁来此处。县城教堂内亦有教义讲习所，所有房屋面积1398平方米，经堂可以容纳100余人。1951年教堂停止活动，堂内用具在土改中分给农民，经堂改做幼儿园。1998年，完全拆除，在原地重新建成居民房。

3.2.3 泸州

清咸丰年间，天主教建纳溪县总堂，由法国神甫艾查雷利传教，发展信徒百余人。同治时，总堂扩建为仿法国式尖圆顶彩色玻璃窗的大型礼拜堂，建筑面积1580平方米，另有房产10间，地产租800石，经书学堂一所，两个班，七、八十人。^[2]天主教建纳溪县天主总堂，下设叙蓬溪、大渡口两个分堂，及马庙、渠坝、上马、沙岭等小分堂，统属宜宾教区管理。叙蓬溪分堂建于光绪十年（1887年），占地1500余平方米，有地产200余石，教徒数百人，管辖上马、合面、中兴等几个分堂。于光绪年间，建立大渡口分堂，没有设专职神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该堂神职人员利用权势，欺压百姓，当地农民义军首领里刘昆阳率众烧毁教堂，后由官府赔偿白银5万两，重建教堂，至1949年，有教徒80余人。

泸州市天主教的传入迟于纳溪，在 1800 年前后。1830 年以前，泸州没有正式经堂，教友集会和传教士主持宗教活动的地点有四处：文庙街（今市府路）、南角头转弯处（今三星街口）、宝庆街七号和十五号、顺城街九号和十二号（前两处遗址已无）。

天主教在泸州先后建立了 6 座教堂：新马路真原堂、南外井沟街孤贫所内本笃堂、小市过江楼天主堂、万定大坪子天主堂、宝藏市天主堂和玄滩镇天主堂。^[3]

泸州天主教会购买街房的最早年份，根据房契记录为同治四年（公元 1865 年）。同治十三年以前，一位姓明的外国传教士来泸州传教时，由泸州部分教友集资，并向宜宾主教借款，于 1874 年在新马路（当时是城垣上）买房产一处，次年动工，1880 年落成泸州第一座天主教堂，距今已有 120 多年历史。^[4]新马路真原堂建成后，外籍传教士来往频繁，不仅城内教友增多，乡镇教友亦复不少。教友较为集中的有兴隆庙七眼井陈姓、玄滩王姓、宝藏周姓、钟姓、余姓、唐姓、万定陈姓、曾姓、福集刘姓等。由于教友剧增，每逢主日（星期日）或四大瞻礼（耶稣诞生、耶稣复活、圣母升天、圣父降临），新马路真原堂就人山人海。因此，在城乡又先后兴建了五座教堂：

① 孤贫所本笃堂。早在 1860 年以前在南外井沟街就由教会建有孤贫所，但无经堂。神父林富敏来泸后，于 1900 年重建孤贫所时，正式设立分堂，是城区第二座天主堂。

② 小市过江楼天主堂。1905 年，外籍神父林富敏用庚子赔款在小市过江楼购买房屋，改建为分堂，这是城区第三座天主堂。该堂没有神父主持，每逢主日或四大瞻礼，才由本堂派神父前去主持弥撒。平时不定期地对在该堂读经书的学生进行教规、教义的考核。

③ 万定大坪子天主堂。原名樟山天主堂，系民房改建，教友较多。最早去万定的是中国神父伍安当、李圣良。1898 年外籍神父吴类思用教案赔款在万定大坪子新建天主堂一座。万定最初属泸州堂口管辖，设本堂后脱离本堂并分辖原泸州的五通、云锦、石马、立石、青狮、宝藏、杨九、万寿、奇峰、玄滩等地。

④ 宝藏市天主堂。1989 年前，由宝藏余姓教友捐赠街房两间作临时经堂（先在由乡政府与邮电所占用）。1898 年用教案赔款在街上买房地一块，后由神父唐德恩主持，于 1934 年在该处新建教堂一座。1943 年由陈宣明副本堂署理该堂。1948 年设立本堂，由熊恺悌任本堂神父，从万定分出，并分辖原万定属的青狮、宝藏、杨九、万寿、奇峰、玄滩等地。

⑤ 玄滩天主堂。1898 年用教案赔款在玄滩镇买了经堂旧址一处（现马路街二组）和街房一栋（现正大街三组），1927 年正式设立经堂后，先属泸州，次属万定，最后属宝藏堂口管辖。

解放前夕，受国民党反共宣传影响和解放初四乡土匪猖獗，泸县万定教堂唐德恩神父与纳溪县护国教堂赵锡龄神父先后来泸住居，两教堂随即停止了宗教活动（万定经堂被学校占用，护国经堂被占用已于1986年10月归还教会）。宝藏经堂因熊神父未离，但宗教活动已经基本停止。到1955年，熊神父来泸州，宗教活动逐渐完全停止，经堂被象乡政府和学校占用，正清退中；玄滩经堂因未设神父，一直由当地教友管理，现在由三户教友居住。小市过江楼经堂，解放后早就租给小市镇人民政府做镇办企业之用，现改由小市镇瓦楞纸箱厂直接向教会承租。

新马路真原堂是泸州本堂神父居住的正堂，减租退押时，因形势的需要，外籍传教士柯斯兰乃将小市中码头、城内的大昌医院和整个真原堂极其附近的教会房屋，于1851年全部出售，作减租退押之用，宗教活动由新马路经堂改在孤贫所经堂。外籍传教士柯斯兰于1952年回国。早已住在孤贫所经堂的周朝鲜神父，1951年即由宜宾教区任命为泸州本堂神父，因此，事实上1951年孤贫所已经代替了真原堂成为泸州天主教唯一的宗教活动场所。1952年，孤贫所交由政府接管后，因所内有经堂，政府和教会在管理上都有困难。后将经堂迁到上平远路131号大同厂院内，这是经堂第二次搬迁。迁入大同厂的经堂是用住宅用房简改而成，不仅面积小，而且房屋破烂、地点偏僻，但是在这里的长达10多年。后经过市委统战部的帮助，与市五金公司协商，用互换房产的办法，即教会以上平远路131号经堂及其后面院坝的产权换市五金公司新马路仓库（即原来的真原堂）产权，双方协议后于1964年经堂才迁回真原堂。

3.3 小结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分布较广，相对距离较远。宜宾教区的天主教堂虽然历经风风雨雨，有一定的损坏，有的甚至被拆除，但是仍有一定数量教堂的保存下来。现存的市区的天主教堂外观大多较完整地保持着初建时的样子，但是少数偏远乡村的天主教堂完整性保持较差，有的教堂室内的带有显著的天主教文化特征的宗教设施甚至被捣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宗教政策的落实，这些天主教堂才有得到保护和修复。

总的来说，由于城市拥有比乡村更为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所以位于城镇的教堂保存得比较完整，也更加有欧洲天主教堂的特色，乡村的天主教堂多采用的当地民居形式，且由于乡村的教堂建筑保护不到位，很多教堂在文革或是教案中被毁坏或者是被占用改作其他用途。

本章注释：

[1] 叙永县县志编写组.叙永县志.民国.第54页

[2] 纳溪县县志编写组.纳溪县志.1995.第546页

[3] 泸州市天主教史编写组.泸州天主教历史概况.2005.第104页~第162页

4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总体风格特征

4.1. 欧洲天主教堂的宗教含义

欧洲天主教堂的平面和空间与其宗教教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换言之, 教堂的每一部分都有具体的宗教寓意。整座教堂象征天国, 初期教会教父奥利振把教堂比作诺厄的方舟^[1], 安全、栖息的地方, 这一点可以从圣堂大厅中间部分、中堂的名称 nave 解释。Nave 一词源自拉丁文 navis, 意指“船”。教堂西向耶稣受难和复活的地方——耶路撒冷, 教堂四面墙壁以及建筑的四方石块, 代表天主教义倡导的四大美德——勇、义、智、节, 教堂穹顶的十字交叉结构正是十字架的象征。还有一些宗教意义可能是教徒出于宗教的狂热增添到教堂象征意义中, 例如从平面解释, 殿堂是耶稣的躯体, 祭坛是耶稣的头部, 若祭坛略偏轴线代表十字架上殉难者基督下倾的头, 祭坛两侧的忏悔室是耶稣被钉的双臂。甚至教堂建筑的主要材料——石块也被认为是象征信仰的坚定性, 粘接全部材料的石灰体现信徒炽热的爱意, 掺和用的水代表起联接作用的精神力量。

天主教传教士出于宗教信仰, 对教堂建筑提出某些基本的、符合教义的要求, 诸如采用西方教堂的内部空间形式, 根据宗教含义决定教堂平面等。这些宗教文化的要求影响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的形成。

4.2 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的总体建筑风格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建造分为两种。其一, 教堂由外国传教士设计。传教士来传教的同时, 也带来了教堂设计图纸, 因此, 教堂建筑风格与传教活动中的天主教修会所属国有着直接关系, 从表 3-2 所列的教堂的传教士来看, 全部来自法国, 所以法国是向宜宾教区输入欧洲天主教堂建筑风格的主要国家。^[2]法国处于南欧与北欧两个文艺复兴艺术领域的策源地中间, 受多种艺术风格和不同思想倾向的影响。而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前后, 法国正处于哥特式复兴时代, 教堂的建造工作由教会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 从巴黎出发的传教士可能多数接触这种法国流行的建筑风格, 并随巴黎外方传教会出现在宜宾教区。其二, 当时的教会直接占用了当地的民居作为天主教堂, 因此, 教堂体现出宜宾地区的传统风格。

宜宾教区的天主教堂, 一座教堂一般没有纯粹的一种风格, 多是以某一种风格为主夹杂其他风格元素。此外, 传入宜宾教区地区的天主教堂受传教士曾经停留地的建筑影响, 教堂在欧洲风格的基础上, 夹杂了殖民地风格建筑的特点, 反映在住宅应用大片回廊或前门廊, 以及柱子不按一定的古典法式与比例处理。无论哪种教堂风格一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 自然会发生形态变异, 但这种

改变不会使其与不同文化产生的建筑形式完全一致，只能是两种甚至多种形式的融合和混生。

4.2.1 具有哥特式建筑特征的教堂

哥特式建筑（“Gothic”）于 11 世纪末率先兴起于法国，而后迅速风靡于欧洲各国（12 世纪-16 世纪），并成为文艺复兴（13 世纪-16 世纪）在建筑艺术上的一大成果。

宜宾教区建筑风格大体呈哥特风格的有：宜宾文星街圣母堂（图 4.1）、双河天主堂正立面（图 4.2）。宜宾文星街圣堂的哥特特色主要表现在：以垂直性为基础，显示线条向纵方向的展开；以尖券、尖形肋骨拱顶、坡度很大的两坡屋面、教堂中的钟楼、花窗棂和朝向天空屹立的尖形塔等为其特点，体现了向上的动态感和升腾感。



图 4.1：宜宾文星街圣母堂



图 4.2：双河天主堂

4.2.2 具有巴洛克式建筑特征的教堂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中，宜宾拱星街圣体堂就是一例，带有明显的巴洛克建筑风格的特征：经堂正立面的曲线构成的多变的曲线轮廓，有色彩艳丽的菱形、圆形的装饰图案，假窗里面雕刻的突出墙面的曲线浮雕；墙面和窗户的凹凸起伏的弧形雕饰装饰也比较浮华夸张（图 4.3）。凹凸分明的复杂构图，在教堂中制造神秘迷惘同时又要标榜教堂富有的珠光宝气的气氛。此外，堆砌装饰和大面积的壁画制造了脱离现实的感觉。

巴洛克建筑风格曾在中国近代建筑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烙印,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巴洛克建筑表达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巴洛克产生于西欧封建制度分崩离析、天主教神权面临生死攸关挑战之时,使这一风格潜涵了动荡时代焦躁不安的情绪,而这种社会局势正和当时中国的情形相当。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导致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急剧衰退。失落之中,国人急切地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填补支撑。于是我们看到,洋务运动及其追随者把巴洛克建筑语汇作为一种改良的标志,运用到国内的多种建筑类型上,如清陆军部衙署主楼立面两翼山墙(图 4.4)。第二,巴洛克风格缓释了中国建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矛盾。中国建筑传统与近代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结构、材料和技术等方面,而巴洛克建筑恰恰在这些方面有相当弹性,它可用中国工匠能用、熟悉的砖木、砖石结构。第三,巴洛克与中国传统建筑之间存在某些观念形态的相似。例如,巴洛克追求动感,而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曲屋檐、屋角起翘等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巴洛克一改西方古典主义以数学为基础的构图法,求助于直觉、感官、想象,而中国传统建筑也是历来重视感官效果,重视由实入虚、即实即虚的意象;巴洛克风格种常用的曲线也正合中国古典建筑美学趣味。

4.2.3 具有宜宾地区传统风格的天主教堂建筑

天主教传入宜宾地区的初期,多购买当地房屋直接作为天主教堂。例如:安溪天主堂(图 4.5)、江安天主堂(图 4.6)、



图 4.3: 宜宾拱星街圣体堂



图 4.4: 陆军部衙署主楼立面



图 4.5: 安溪天主堂



图 4.6: 江安天主堂



图 4.7: 泸州真原堂



图 4.8: 纳溪天主堂

泸州真原堂（图 4.7）。

泸州真原堂为3间5楼的石坊，檐角翘起，正脊中有十字架装饰高龕，明间有“真原堂”三字浮雕。建筑中的门，随其所处位置的不同，有很多名称，不过，都均属于两大系统，即如梁朝顾野王的《玉篇》所云：“在堂屋曰户，在区域曰门。”也就是说，门有两大类，一类是划分区域的门，另一类是建筑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牌坊门即是划分区域的门。关于牌坊的起源，有两条线索：一说是牌坊源于“表闾”坊门，强调字牌旌表关系；另一说，则将牌楼是由“连阙”演变而来。牌楼由立柱、额坊和檐部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牌坊是科学技术与建筑技术统一的物质实体，建造时受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不同的气候、地理、材料，不同的历史文化、经济技术、生活习俗与审美情趣，会产生不同的形式和风格的牌坊，形成地方特色。从大的范围上说，北方寒冷干燥少雨，多建木坊，平面“一”字形，造型典雅稳重；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气候炎热多雨，雾天很多，特别是冬夏季的川南宜宾地区，整天难见太阳，因此，几乎都是石牌坊。

特殊的社会状况促使教堂选取了所处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下最适宜的建筑形式。清政府禁教期间，法国神父在教民家中的夹层墙中藏匿多年，进行传教活动。这些天主教堂选择了当地的富绅宅子作为天

主教堂，堂区大门多重新修建，有代表天主教的十字架。

4.2.4 中西建筑风格相互渗透的天主教堂建筑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中，中西方建筑风格相互渗透的教堂有纳溪天主堂。纳溪县天主堂经堂的正立面和背立面形式采用的中国牌楼门样式，可是侧立面的窗户采用哥特式的尖券窗，屋顶也是中国传统的圆筒瓦（图 4.8）。纳溪县天主堂的外立面现在正在翻新，墙面用石灰勾出了砖缝，除教堂正立面重庆改建外，其他都是维持原状，只是进行了翻新。

4.3 小结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建造分为两种：一是传教士来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教堂设计图纸；二是当时的教会直接占用了当地的民居作为天主教堂，教堂体现出宜宾地区的传统风格。

宜宾教区的天主教堂风格大体有四种：哥特建筑风格、巴洛克建筑风格、中西建筑风格相融合、宜宾地区传统建筑风格。且宜宾教区的一座教堂一般没有纯粹的一种风格，多是以某一种风格为主夹杂其他风格元素。

本章注释：

- [1] 赵一舟神父.《见证》月刊.2003 年 1 月份
- [2] 《天主教历史》记载：在 1914 年全球各地的传教士中，有 2/3 是法国人。

5 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的基本特点

建筑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在建筑的总体形象上,而“建筑形象常常是通过建筑环境的布局、建筑群体的组合、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平面布置、空间组织和内外装饰,以及建筑材料所表现的色彩、材质、光影等多方面的处理,形成一种综合性的艺术”^[1]。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在上述各要素的处理上独具特色,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5.1 天主教堂建筑的总体布局

天主教堂建筑群的主体建筑是教堂,作为附属建筑的食堂、宿舍、厨房、工房等,既有崇拜上帝、守护“圣地”的功能需要,又是神父、牧师、修士等人生存或生活的功能满足。而这种由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所构成的教堂建筑群,反应出神和人的地位区别,也是两者的主、附关系的结合。

5.1.1 中国传统院落式布局

天主教传入宜宾教区的初期,为避免被官府发现,教堂选在富有教民的宅院内或是直接购买民居作为教堂,导致以后教堂建筑格局多是中国传统院落式布局。由于四川民居一般采用小天井,可供传教士选择的院内空地不多,只能见缝插针在稍大的庭院或在菜园内另辟一处。在以后的天主教发展过程中,因为合院建筑提供的空间能适应天主教堂的各种机能,建筑前后的大小庭院可以满足各种行为的发生,所以合院式格局成为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的较早形态。

宜宾教区的合院住宅充分反映传统家庭制度,建筑群有明显的轴线,经堂等最重要的建筑配置在中心线的主轴上,附属房屋排列在两侧。教堂建筑借用传统布局原则,划分教会的尊卑,重视中轴线,格局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单体建筑随使用功能发展和观念变迁而发生了变化,以耶稣取代了原来格局中祖先的位置,从祖屋、厅堂变为教堂,其他附属建筑对称布置。

天主教堂建筑逐渐融入了传统宅第的建筑形式,宜宾教区的教堂布局多采取传统的合院形式,但是外来的宗教教义和文化也会改变传统的空间布局,主要是教堂西向特征打破了原来固定的场所秩序,总平面布局并不遵守完全固定的格局而是比较灵活处理建筑关系,形成特有的地方教堂建筑群平面。根据经堂在总平面所处位置,大致分以下两种平面:

- a 经堂位于建筑群中轴线上(附录 C)

宜宾教区经堂位于建筑群中轴线上的有：安溪天主堂、双河天主堂、泸州市真原堂、拱星街圣体堂。将教堂经堂和堂区大门列中轴线上，附属房间位于经堂两侧，如：安溪天主堂、双河天主堂、泸州市真原堂。泸州真原堂教堂建筑中轴线依次布置：堂区大门、前花园、过厅、后花园、经堂，形成二进院落，学校、住所等附属房间对称位于中轴线两侧。也有将附属房间对称布置于经堂后侧的，如：拱星街圣体堂。

b 经堂偏于中轴线一侧（附录 D）

宜宾教区经堂偏于中轴线一侧的有：江安天主堂、文星街圣母堂。教堂建筑以经堂和其他附属房间围合成西方三合院式的修道院布局，以楼围合，在中间形成天井。

宜宾教区多数教堂建筑因天主教特殊的方位朝向要求，以东西作为主轴线走向。

5.1.2 教堂独栋布置

教堂由经堂单独组成，周围没有钟楼和其他附属房间，如纳溪天主堂。

5.2 教堂单体建筑研究

5.2.1 平面形式

天主教教会规定圣坛必须在教堂的东端，这种面宽窄而进深长的平面完全不同于传统建筑的横向平面布置。从传统木结构考虑，木材的粗细会限定梁柱结构的跨度，无法满足平面长宽比例要求，只能改变排列方式。只有巴西利卡平面更容易与传统的木构架结合，满足空间要求，形成宜宾教区教堂平面的常用模式。

教堂多以简单的三门式入口开始，中厅以祭坛结束，两侧廊尽端是圣器室、神父休息室或忏悔。有的教堂祭坛外围有一过道，作为神父的休息空间，如：纳溪天主堂。祭坛前有一排栏杆隔离了神与人，在两侧外墙多留小门，供传教士或住宿教徒出入内院。因为天主教堂的平面被赋予宗教意义，为了强调祭坛的中心地位，长方形平面后部的祭坛都向外做圆形或多边形突出，而没有如此处理的教堂平面，会采用内部划分的方法弥补，使祭坛成为狭长空间。

宜宾教区的教堂平面形式都是采用的巴西利卡式平面。巴西利卡是基督教常采用的平面形式，长方形的大厅，纵向的几排柱子把它分为几长条空间，中央的较宽，是中厅，两侧的窄一点，是侧廊。这种建筑物容量大，结构简单，便于群众集会，所以被天主教会选中。这与拜占廷的建筑是相关联的，拜占廷原是古希腊与罗马的殖民地，而拜占廷建筑承袭了罗马帝国建筑风格，所以早期的教堂

形式都采用古罗马流行的多功能厅式样，巴西利卡建筑形式被人们称为早期的基督宗教建筑。

由于受到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平面型制不完全同于欧洲教堂中常用的典型的巴西利卡（图 5.1）。这主要表现在：有的教堂平面没有突出的圣坛，有的教堂将圆形祭坛改为六边形、八边形或者正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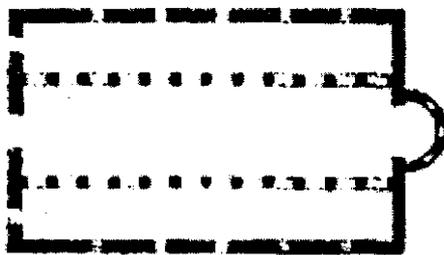


图 5.1: 巴西利卡式平面

图 5.1: 巴西利卡式平面

将这些天主教堂的平面形式分类，有如下两类：

a 按平面一端有无突出的圣坛来分：

1) 平面一端有突出的圣坛的教堂是：江安天主堂、文星街圣母堂、拱星街圣体堂、双河天主堂、泸州市真原堂。（附录 A）

2) 平面一端没有突出的圣坛的教堂是：安溪天主堂、纳溪天主堂。（附录 B）

b 按经堂入口山墙面有无外廊来分

1) 有外廊的教堂是：文星街圣母堂、拱星街圣体堂、泸州市真原堂、安溪天主堂。（附录 A,B）

2) 没有外廊的教堂是：纳溪天主堂、江安天主堂、双河天主堂。（附录 A,B）

5.2.2 外部形体

a 屋顶

建筑构架的形状决定了屋顶的形式。教堂屋顶的重量由木梁柱支承，两边的木柱外包青砖，采取全包或外包半柱而室内仍露出半边木柱，柱间以砖墙或者竹骨泥墙填充或者木板填充。由于川南宜宾教区气候温和多雨，小青瓦坡屋面已是适应当地气候的成熟乡土形式，这恰好与欧洲教堂坡屋顶的基本形式相调和。但川南建筑出檐深远且常常带檐廊，这又与欧洲教堂屋顶有所不同。

清代以后，四川房檐下已经出现不施斗拱，最常见的做法是撑弓支撑水平挑梁，梁端立短柱，柱上置檩条，柱下做垂花，上雕传统花饰。砖造建筑加以中国固有的屋顶，保持屋檐深远且轻巧，泸州真原堂的出檐就体现了当地撑弓作法（图 5.2，图 5.3，图 5.4）。同时“入乡随俗”，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处理手法，在建筑外加回廊，以檐柱支撑出挑的檐口，这种做法普遍用在教堂的附属房间，有的也用在经堂，如安溪天主堂（图 5.5）、江安天主堂（图 5.6，图 5.7）。经堂屋顶多采用两坡顶，屋顶正脊中间多有“压胜”^[2]（图 5.8，图 5.9，图 5.10），屋角有的有起翘（图 5.11）。如果屋檐以斜撑出挑，屋顶和墙体之间还有过渡，可以延伸屋面，增大屋面与屋身的比例。祭坛处的西式弯顶多用圆形攒尖顶代替，屋面

檐口用斜撑出挑，如果祭坛是多边形，屋顶或披檐则变为六角或八角，如：文星街圣母堂(图 5.12)、拱星街圣体堂(图 5.13)、江安天主堂(图 5.14)、双河天主堂(图 5.15)。

泸州市真原堂的建筑风格完全接近地方传统建筑，充分展现了地方建筑的美。教堂外观显著特征是：出檐撑弓作法，正立面以灰色为底点缀少量红色。



图 5.2：泸州真原堂撑弓作法 1



图 5.3：泸州真原堂撑弓作法 2



图 5.4：泸州真原堂作法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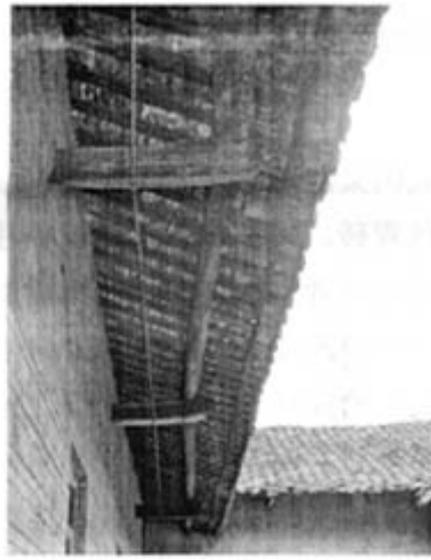


图 5.5：安溪天主堂出挑作法



图 5.6: 江安天主堂出挑作法 1



图 5.7: 江安天主堂出挑作法 2



图 5.8: 江安天主堂屋脊“压胜”



图 5.9: 拱星街圣体堂屋脊“压胜”



图 5.10: 泸州市真原堂屋脊“压胜”



图 5.11: 拱星街圣体堂屋角



图 5.12: 文星街圣母堂祭坛外立面



图 5.13: 拱星街圣体堂祭坛屋顶



图 5.14: 江安天主堂祭坛外立面



图 5.15: 双河天主堂祭坛外立面

b 外墙形式

因为欧洲天主教堂内部空间高敞，作为承重构件的墙体都直抵屋檐下，中间无任何构件分割，依靠墙面材料的几何形状、尺寸大小、色彩、质感以及墙上装饰共同合成建筑的外部形象。宜宾教区天主教堂虽然仿照西方教堂的墙体形态，但在材料和技术处理上却采用了不同形式。

由于宜宾教区教堂的墙体多不是承重构件，因此在墙面材料使用上有一定的灵活性。一是柱间用清砖代替石材，或裸露砖面或在表面做装饰；二是柱间下部采用木板，上部采用编的竹子，空隙里敷泥巴的做法作为柱间填充，如江安天主堂柱间墙面纵分为三，中间设木制方窗，窗户周围是竹骨泥墙外抹白灰



图 5.16: 江安天主堂墙面做法

外露木构架间亦填充粉墙，彻底改变了教堂的外墙形式（图 5.16）。

教堂墙面主要作水平划分，以窗沿线在水平方向上自然划分为二段，上层通常是木窗，没有表面装饰，充分表现木材的肌理和构造方式，底层为了勾勒装饰线脚或为圆木柱添加装饰柱础，通常以抹灰略加修饰。因为没有条件安装更多的玻璃，为了防止雨水从高大的窗户渗入室内，不同教堂采用不同的技术处理方法，形成特征各异的传统建筑形象。常用的手法是以斜撑加宽屋檐，增加窗下墙高，使窗户尽可能在屋檐遮蔽风雨的范围内。还有在高矮两片墙交接处，高墙伸出腰檐遮蔽风雨，如：泸州真原堂（图 5.4）。

5.2.3 内部空间

教堂是供天主教徒集会和收敛心神，与世俗划清界限的场所，大量有关西方文化的内容夹杂在教堂造型艺术的一般性质中，被施加于不同建筑部位，带有一定的欧洲建筑特征，同时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的空间仍然反映出西方文化内涵。但是不同的文化对空间的宗教意义有不同的领悟。中西方不同的结构体系赋予建筑空间不同的文化特征，甚至改变了天主教堂的建筑风格。宜宾教区天主教堂通过材料、技术、形式营造具有宗教感情价值和感召力的内部空间，以巴西利卡式标准的空间安排回应欧洲天主教的召唤。传入川南宜宾教区的天主教堂保留了西方教堂内部空间的定式：教堂内部空间被抬梁式木屋架的两行柱子分隔成中殿和侧廊，仅在平面上突出祭坛的中心地位，或东端是半圆形或多边形的圣坛，圣坛顶部以攒尖顶升高屋架来强调。

尽管宜宾教区天主教堂与欧洲教堂内部的图式一致和界定空间一致，但是宜宾教区教堂是梁柱承重体系，教堂柱子材质不同，柱间距可能更符合木构架标准，柱式处理趋向乡土化。宜宾教区教堂的内部空间吸收了川南地方建筑特色，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教堂的中式建筑空间的方正平，淡化了天主教堂浓重的宗教气氛。

a 祭坛

祭坛是天主教堂室内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教堂入口正对的中厅的末端，为一突出空间，有的与大厅同高，如：拱星街圣体堂祭坛（图 5.17）、文星街圣母堂祭坛（图 5.18）、纳溪天主堂祭坛（图 5.19）；有的比大厅高，如：双河天主堂祭坛（图 5.20）、泸州市真原堂（图 5.21）、安溪天主堂祭坛（图 5.22）。祭坛上放置祭台，祭台上供奉着天主教的信物——十字架。祭坛上方的墙壁上供奉有神像，包括耶稣像、圣母(玛利亚)像、圣父(若瑟)像。这些圣像是天主教徒祭拜的对象，有的是一尊塑像或一幅画像在祭坛墙壁正中，例如：泸州真原堂、宜宾文星街圣母堂、安溪天主堂、江安天主堂、纳溪天主堂；有的祭坛墙面开有窗户，无法挂像，塑像或画像便放在祭坛中间的桌子上面，例如：拱星街圣体堂、双河天主堂。



图 5.17: 拱星街圣体堂祭坛



图 5-18: 文星街圣母堂祭坛



图 5.20: 双河天主堂祭坛



图 5.19: 纳溪天主堂祭坛



图 5.21: 泸州市真原堂祭坛



图 5.22: 安溪天主堂祭坛

b 中厅和侧廊空间营造的宗教气氛

位于宜宾教区的近代天主教堂，因为其规模一般都不大，而且这些教堂室内空间结构大部分都比较单一，中厅和侧廊的高差不大，有的甚至没有高差，使这些教堂的室内难以达到像欧洲的教堂那种令人感到渺小的效果。



图 5.23: 安溪天主堂经堂



图 5.24: 双河天主堂经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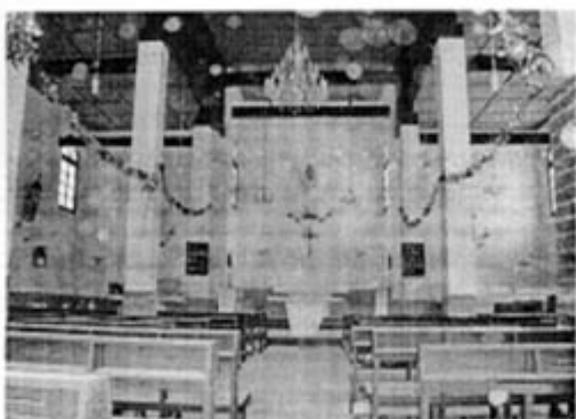


图 5.25: 纳溪天主堂经堂



图 5.26: 江安天主堂经堂



图 5.27: 文星街圣母堂经堂



图 5.28: 拱星街圣体堂经堂

多数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室内空间开敞，几乎一览无余，因此难以给人的心灵强烈的感染力。（图 5.23、图 5.24、图 5.25、图 5.26）

但在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中，也有一些教堂的室内空间处理较好地烘托出宗教神秘的色彩、教堂室内中厅和侧廊形成的纵深方向的狭长空间和昏暗的灯光也为教堂创造出了静谧、幽远的宗教气氛，例如：文星街圣母堂（图 5.27）和拱星街圣体堂（图 5.28）。

5.2.4 细部处理

a 柱

中西方的柱在功能上大体相同，都是承重构件。但是中式柱比较注重柱础，柱上斗拱取代柱头的功能；西式柱的造型重点在柱头，柱础相对装饰简洁。西方柱式可分为檐部、柱子和基座，而柱子又分柱础、柱身、柱头三部分，由于柱子各部分尺寸、比例、形状的不同，加上柱身处理和装饰花纹的各异，而形成各不相同的柱子样式。

川南宜宾教区的柱式传入的西方柱式主要是科林斯柱，当地的工匠创造性的将这些特色融入教堂，让中西柱式在教堂中重新进行组合。

1) 柱头

现存的宜宾教区教堂中的柱头，分析大致有两种类型：

① 植物纹样

教堂建筑中的柱头有木和石头两种，雕刻多数是照搬西方的卷草或藤蔓等，这种做法的本意是通过植物自然生长形态过渡柱与梁的交接，但是西方的卷草直接移植到的中式柱子上却少了生机。变形的卷草平贴在柱表面或向外弯曲过度，柱头不再丰满有力。城市中的教堂因出入的外国人较多，其中不乏专业人士，会提供完整的柱式图样，花篮柱头的比例和形式较乡村传神。。如：文星街圣母堂（图 5.29、图 5.30）、和拱星街圣体堂（图 5.31）。



图 5.29: 文星街圣母堂
柱头 1



图 5.30: 文星街圣母堂
柱头 2



图 5.31: 拱星街圣体堂
柱头

② 中国传统造型

在泸州真原堂中有特殊形式的柱头装饰，它不是受力过渡构件，而以纯粹装饰性面孔出现。从柱头位置挑出装饰构件，上面雕着花等传统植物图案。

总体上说，相对于四川其他地区，宜宾教区的天主教堂大多柱头线条简单，形式朴素大方，没有僵硬地套用欧洲柱式。大多教堂甚至没有明显的柱头。

2) 柱身

川南宜宾教区地区木柱较为多见，常取木之原形，柱身上下直径一致，从结构力学和视觉上保持它的承重性，木柱上很少用雕刻装饰，以避免破坏它的完整性。由于未能解决教堂结构与形式的统一性，教堂建筑的整个结构仍然是抬梁式木构架，所以初期教堂多用圆木柱，逐渐出现内木外包砖的夹心柱和整条青石柱，如：文星街圣母堂经堂内的柱子采用的是 12 根整条石，现在已经列为市级保护文物。承重体系一般以柱落地，工匠出于对原有柱子形状的惯性继承，让柱身的外观形象保持传统的圆柱形状，将砖作成半环，贴柱砌。外砌的青砖不是用来承重，只是起包护作用，甚至后期工艺条件成熟，以砖承重为主的建筑仍然保留木柱。

3) 柱础

柱础作为柱与地面的联接构件，在形制及雕饰上易引人注目。传统柱础主要分为两部：“其上直接承柱下压地者为柱础；在柱与础之间所加板状圆盘为趺。”宜宾教区的柱础均以木、石为料，石质既可防潮，且高出地面，可以避免柱脚腐蚀或碰坏，其主要功能是将柱身集中荷载布于地上的较大面积。西方柱式打破了地方建筑的柱础样式常规，出现多种中西组合的样式，雕饰题材内容更加多样。



图 5.32: 泸州市真原堂柱基



图 5.33: 江安天主堂柱基

教堂内的石柱础主要有扁鼓形，如安溪天主堂、泸州市真原堂（图 5.32）；四方抹角形；六边形，如拱星街圣体堂、江安天主堂（图 5.33）。有的柱础，工匠们运用高超的制砖技术，烧制出莲花瓣形浅浮雕，轮廓柔和，线条饱满，造型别致。西方柱式的基座应用到中式柱子中，使柱础的高度比例大大增加，而且样式简单，柱础只通过数层厚薄相间的线脚与柱身和地面相接。

b 门、窗

教堂的门窗造型多数采用西方的拱券式，天主教堂出现的拱券种类有半圆拱、双圆心尖券、尖三叶花瓣拱等，如：拱星街圣体堂就是采用的半圆拱（图 5.34）。

教堂窗户采用川南宜宾地方窗心花样，主要有风车纹、菱格，雕花窗心等。如：文星街圣母堂的窗式组合以哥特式装饰性窗格——尖券和玫瑰花窗为基本单元，二个尖券窗顶着一个圆形花窗（图 5.35、图 5.36）。但是，宜宾教区大多数教堂所表现出西方建筑的尖券特征，砌筑方法没有太多变化，且装饰较简洁。（图 5.37，图 5.38，图 5.39，图 5.40，图 5.41）

在具有当地风格的教堂中用的长方形木窗和中国传统民居中的雕花门窗。如泸州市真原堂经堂门雕刻极其精致（图 5.42），江安天主堂的镂空窗（图 5.43）。



图 5.34：拱星街圣体堂立面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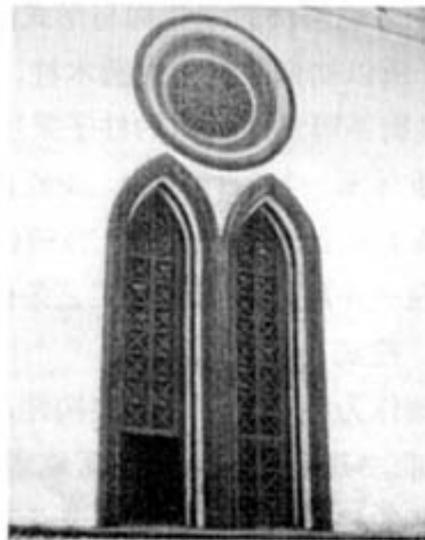


图 5.35：文星街圣母堂立面窗 1



图 5.36：文星街圣母堂立面窗 2



图 5.37：双河天主堂立面窗 1



图 5.38: 双河天主堂立面窗 2



图 5.39: 安溪天主堂立面窗



图 5.40: 纳溪天主堂立面窗 1



图 5.41: 纳溪天主堂立面窗 2



图 5.42: 泸州市真原堂经堂门



图 5.43: 江安天主堂窗

c 装饰

墙体装饰的形式主要有壁画、浮雕、铸制、镶嵌、彩绘、标识等。在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中，常见的有雕刻。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的浮雕多采用莲花、花瓶、花草、飞鸟等一些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也有玫瑰窗浮雕。



图 5.44.a: 泸州市真原堂雕花 1



图 5.44.b: 泸州市真原堂雕花 2



图 5.44.c: 泸州市真原堂雕花 3



图 5.45.: 泸州市真原堂雕花

泸州市真原堂内的雕花极其精致，采用花瓶、鹤作为主题（图 5.44a，图 5.44b，图 5.44c，图 5.45），双河天主堂壁柱中间加以葡萄浅浮雕（图 5.46），拱星街圣体堂窗户周围，大门入口周围以花草、曲线为主题的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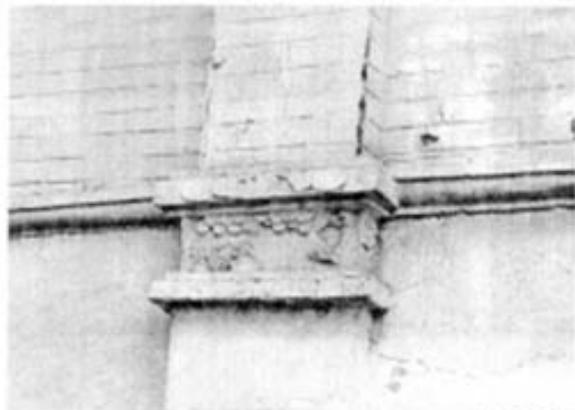


图 5.46: 双河天主堂墙壁浮雕

5.2.5 材料

a 砖

四川掌握土胚砖的制作和施工技术是在夏商时期,后经窑烧制成手工砖,到了明清时期制砖技术的提高,用砖的房屋猛然增多,创造出各种砌筑方法,川南宜宾教区的天主教堂较多砖墙。

b 石

川南石材资源丰富,由于石料的采取、运输和施工需要许多人力和物力,始终在建筑材料中居于次要地位。工匠常就地开采石材,用作房舍柱础、墙基和勒脚、门窗过梁、柱以及牌坊、桥等,教堂建筑中常见的是以石为柱础。

c 木

川南地区气候潮湿多雨,适宜树木生长,所以传统建筑结构的基本材料是木材。川南多产楠木,因此教堂主体结构体系多用粗大的楠木,教堂住宅也大面积使用传统建筑材料。

5.3 堂区大门和附属房间

5.3.1 堂区大门

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的堂区大门较简单,以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为主。安溪天主堂和泸州市真原堂的堂区大门都是中国牌楼门形式(图4-5、图4-7),多数教堂的堂区门只是一分隔空间的隔墙。安溪天主堂的堂区大门是中国牌楼门形式。

5.3.2 附属房间

宜宾教区的近代天主教堂,大多数都是由主体建筑——经堂和周围的附属建筑组成,附属建筑多采用当地传统民居形式,采用两坡屋顶,屋架使用穿斗和抬梁结构,是用泥巴墙或者砖墙。

5.4 小结

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的总体布局多采用中国传统庭院式布局,因天主教特殊的方位要求,建筑群多以东西向作为主轴线走向。

教堂平面全部是基督教早期采用的巴西利卡平面形式,在祭坛处稍有不同。教堂的外部形体的屋顶多采用两坡顶和与当地气候相协调的小青瓦,少有圆筒瓦,屋脊正中多有压胜,檐下用撑弓支撑水平挑梁。外墙也多采用当地民间做法。外部形态与装修体现出更多的传统建筑与西式建筑形式的融合的特点。

教堂空间形式多较简单,没有西方天主教堂表达出的浓厚宗教气氛。在建筑材料上,宜宾教区教堂建筑大多采用当地传统的建筑材料:石、木、砖。

建筑结构形式也多采用抬梁和穿斗结合的中国建筑技术形式。

教堂建筑总体上反映了天主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的特点。

本章注释：

[1] 李允铎.《华夏意匠》.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第 48 页

[2] 在传统聚落中，面对一个全然陌生的新环境下，对于一切来自大自然、宇宙未知的神秘力量，人们采取一系列相对应的行动。在传统的观念下，透过特定的压胜物来化解宇宙间的任何鬼邪之祸，或收纳来自宇宙间的各种吉祥之兆，以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居住安适感。“压胜”，依字面解释，即避邪压煞之意。“压胜”用在住宅中，为了防范妖魔鬼怪的一些保护措施，有避邪压煞的保护作用。在《鲁班经》一书中，对民宅压胜物有一描述，依压胜物设置的位置，主要可分为五种，即：①屋顶压胜物，②屋墙压胜物，③屋埕压胜物，④门楣压胜物，⑤中梁压胜物。本文中提到的“压胜”指的是屋顶压胜物。

6 近代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典型个例

6.1 拱星街圣体堂

6.1.1 拱星街圣体堂的由来和历史沿革

光绪四年至二十五年(1879—1899年)川南教区从四川、宜宾发生的几次教案中掠取了赔款纹银百余万两,法国巴黎外方传教士抽出部分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1897—1900年)在草市上修建了天主堂,即今拱星街天主堂,名圣体堂。教堂位于宜宾市翠屏区拱星街30号。整座教堂建筑占地面积400平方米,建筑面积377.86平方米,能容纳300余人。教堂有较好的吸音效果。教堂后侧有一栋二楼的木质结构房屋(原藏经楼),建筑面积有227.76平方米;教堂后侧建有修女楼,建筑面积307.47平方米;南侧有神父楼,建筑面积595.32平方米,教堂的小院和花园和教堂整体占地1320平方米。教堂于1984年开放。

6.1.2 拱星街圣体堂的教堂风格和特征

a. 教堂建筑的总体布局

拱星街天主堂位于宜宾市市中心,选址在较平坦的地方,教堂建筑基本位于同一水平标高。教堂没有钟楼,经堂和堂区门位于中轴线上,附属房间对称布置地布置在经堂后左右侧。

b. 平面

拱星街天主堂的平面采用了基督教教堂早期采用的巴西利卡,没有外廊,有突出的祭坛。(附录A)

c. 立面造型及风格

拱星街天主堂经堂的立面总体风格呈巴洛克风格(图6.1)。

正立面构图由垂直的三部分组成,两边的立面构图完全对称。两边的立面被划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部分是一扇半圆形拱门,是经堂正立面的次入口。拱门两边对称地紧挨布置着一根圆柱,柱的一半隐在墙内,柱头是变形的科林斯柱式,柱子上半部分用彩色玻璃镶出正方形和卷心草的图案(图6.2a、图6.2b)。柱子上面支撑着山花,山花进行了变形,三角形改成了半圆弧形和两边对称的水平线条组成“凸”形,屋角有起翘(图6.3a、图6.3b)。上部墙身正中有两个连接在一起的半圆形假窗,比例很瘦长,长宽比约为4:1,假窗中间由彩色玻璃砖贴出一些图案。墙身上面的屋顶形式采用平屋顶,中间有半圆弧把水平线打破。屋檐有多层叠涩向内凹进,线条较复杂。半圆形山花下面正对着一个圆形玫瑰假窗。

正立面中间部分也相应地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部分是一扇半圆形拱门，比侧廊的稍宽、稍高，是经堂正立面的主入口。拱门两边对称地布置了两根半隐在墙内的圆柱，柱头是变形的科林斯柱式，柱子上半部分用彩色玻璃镶出卷心草的图案。柱子上面支撑着山花，山花也进行了变形，和侧廊部分相同的凸“形”。上部墙身中间有三个连接在一起的半圆形假窗，窗的比例很瘦长，长宽比约为4:1，假窗中间由彩色玻璃砖贴出花瓶图案。墙身上面的屋顶也是变形的山花，屋檐有多层叠涩，线条极复杂。半圆形山花下面正对着一个圆形玫瑰假窗。正中间部分的顶上有代表天主教的十字架。每间屋顶的边上有中国建筑中常见的云纹装饰。



图 6.1: 拱星街圣体堂正立面



图 6.2.a: 拱星街圣体堂正立面入口 1



图 6-3a: 正立面入口柱子 1



图 6.3b: 正立面入口柱子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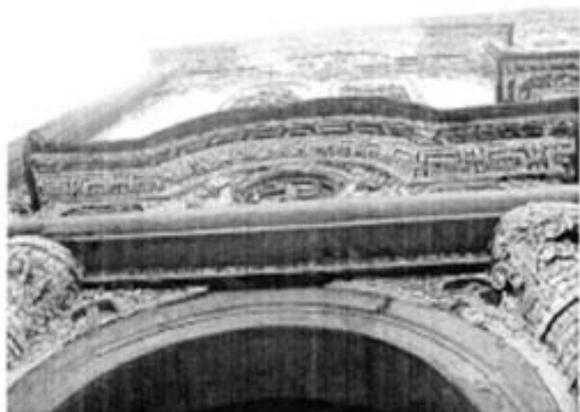


图 6.2.b: 拱星街圣体堂正立面入口 2



图 6.4: 拱星街圣体堂立面山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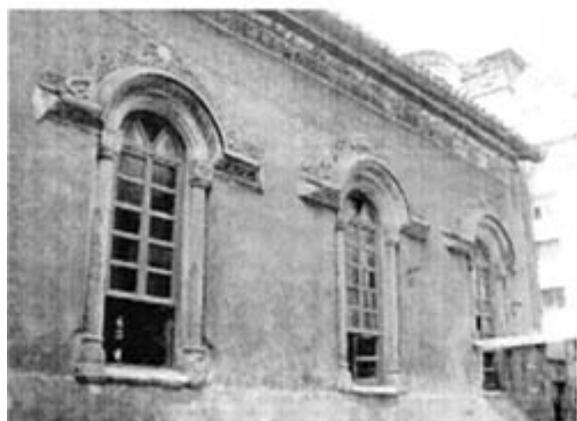


图 6.5: 拱星街圣体堂侧立面



图 6.6: 拱星街圣体堂屋脊“压胜”

整个正立面墙面用彩色玻璃砖堆砌装饰和大面积的图案，多处采用弧线或者圆形浮雕，墙面线条多且复杂，让人觉得很奢华和珠光宝气。

教堂的侧立面由墙基，墙身和上面的两坡屋顶组成（图 6.5）。窗户为半圆形拱窗，窗的长宽比例约为 3: 1。墙面由 6 扇窗户均分，窗户外面贴有券柱式窗套。柱身是木质的圆柱，柱基是正方形，柱基与柱身间有两圈环形过渡；柱头也是方形，与柱身间也有两圈环形过渡，柱基和柱头上面雕刻有图案，半圆形拱券三层向内凹进。券柱上部有半圆拱环墙面装饰，圆环边与柱子相切处向外水平延伸，形成和正立面对应的“凸”形装饰，装饰三层向外凸出墙面，凸出面有半圆环浮雕。在“凸”形装饰外面有一些由曲线、圆形和扇形元素构成的浅浮雕图案装饰。总之，整个窗子给人一种很华丽的感觉，屋顶采用一般的青瓦两坡顶，屋檐下面有多层叠涩，线条较复杂，且每层叠涩上都有绘画、浮雕装饰。屋脊正中有塔形的“压胜”（图 6.6）。

教堂背立面的祭台墙面是八边形的，屋顶是攒尖顶，屋角起翘，有点像中国传统园林中的亭子，屋顶和两坡屋顶相切。由于四川的气候适宜植物生长，墙面

已经长满了爬藤植物。

教堂后侧的一栋二楼的木结构房屋是神父的住所(图 6.7)。建筑有外廊,最左侧有楼梯可以上到二楼的走道,进入二楼的房间(图 6.8)。建筑是抬梁结构,屋顶是两坡屋顶,屋脊正中有代表天主教的十字架“压胜”,十字架下面和旁边分别有葡萄的深浮雕和曲线雕刻装饰,屋脊两边也有一点浮雕装饰。屋檐有起翘,且有较复杂的浮雕装饰。

d. 内部空间

教堂没有钟楼,经堂内部空间没有夹层,因教堂结构选用的抬梁结构,教堂中厅比侧廊高,侧廊的吊顶是平屋顶,由多组拱券组成,中厅的吊顶是拱顶(图 6.9a、图 6.9b)。多边形后殿上的屋顶则为攒尖顶。教堂内四排束柱作为支撑的框架结构,两边束柱的柱身一半隐在外墙里面。束柱由三根柱子组成,其中一根直达屋顶起支撑作用,另外两根在侧廊吊顶标高处,分别和旁边的柱子形成拱券,柱头是科林斯柱式(图 6.10、图 6.11)。



图 6.7: 神父住所



图 6.8: 神父住所二楼走廊



图 6.9.a: 从祭坛向大门方向看



图 6.9.b: 从大门向祭坛方向



图 6.10: 经堂侧廊



图 6.11: 经堂柱子单元

教堂两侧墙面被两条线脚划分为三部分，窗户都在一米左右的那条线脚的上面。窗户是半圆拱窗，窗的长宽比例较大，约为 3: 1。窗户外面贴有券柱式窗套。柱子是木质的圆柱，柱基下面是一个立方体，柱基有两圈环形，柱头和柱基对应的也是方形，上面雕刻有花纹。半圆形拱券三层向内凹进，券柱上部有半圆拱环，圆环边向外水平延伸到束柱边。教堂室内装饰的哥特风格体现在：束柱、拱券等方面。

教堂入口的右侧有一很大的石头容器，是装圣水的容器（图 6.12）。容器呈杯状，杯壁上有复杂的花草、曲线和拱券浮雕。两侧的墙壁上悬挂有以《圣经》故事为内容的油画，圣坛上方有耶稣的画像。



图 6.12: 圣水石容器

e. 材料

拱星街圣体堂是一座砖木结构教堂，外墙采用的砖，地面是石板，门窗、柱子、吊顶等是杉木，教堂大门的牌坊当时用酒水浆搅拌石灰。

6.2 文星街圣母堂

6.2.1 文星街圣母堂的由来和历史沿革

宜宾市圣母堂始建于光绪初年，光绪二十七年（1899年——1905年）改建成

现大教堂。座落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文星街 55 号，是天主教四川省宜宾郊区主教座堂。并由四川省宗教局明确列为重点保护教堂。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来四川宜宾（原叙府）传教时修建。当时任川南叙府（宜宾）教区的主教是法国人孟主教。教堂东侧是一栋木结构房屋，两层楼面积 180 平方米。教堂建筑面积 958.39 平方米，占地面积 1020 平方米，能容纳 1000 余人。整个教堂和附属房间、花园广场等总占地 1327 平方米。宜宾市文星街圣母堂于 1994 年开放。

6.2.2 文星街圣母堂的建筑风格及特征

虽然文星街圣母堂的外观及内部空间的其他风格的装饰元素较多，但其平面形制、形体比例仍体现出哥特建筑的特征。

a. 教堂建筑群体布局

教堂选地址在宜宾市繁华街道边，从街道远远就可以看见教堂的尖顶。教堂前有一个面向街道开敞的小型花园广场，约 200 平方米。教堂东侧有一木结构二层房屋，为教堂的附属房间。

b. 平面

文星街圣母堂的平面形制为早期基督教堂常用的巴西利卡式，祭坛突出，有外廊。（附录 A）

c. 立面及外观

文星街圣母堂的立面总体风格的哥特式。立面构图由三部分构成：下部的门廊，上部的山墙面和两侧对称布置的的钟楼。两个钟楼把立面分成垂直三部分，中间较两边宽（图 6.13.a、图 6.13.b、图 6.13.c）。

教堂的正立面是两坡屋顶的山墙，屋顶坡度较陡。正立面下面的中间部分，由下面的教堂入口和上面的栏杆组成，教堂入口采用的是哥特式的尖券门，门外有两层凸出的尖券门套，券门左上方和右上方分别有一个三花瓣的浮雕，花瓣中有花草浮雕装饰。上面的围栏有一排镂空的哥特式尖券洞，围栏顶部有多层的线脚装饰。上下部分间由挑檐很少的中国传统圆筒瓦顶分割，瓦顶上方有排水孔，下方有较复杂的叠涩。门廊左右部分对称，和中间的立面相同，只是高度之较低，宽度较之窄，屋檐下面的叠涩更加复杂。

教堂的钟楼的平面式正方形的，立面大致分为上下两段，上面较下面略向内收。下段由三花瓣浮雕和其上部的尖券假窗组成。假窗的长宽比大约为 4:1，假窗两层向内凹进，中间布满镂空的花纹。上段立面大致呈正方形，正中有一木质圆窗（图 6.14），两层向内迭进。钟楼采用的平屋顶，上盖瓦，屋檐下面有多层跌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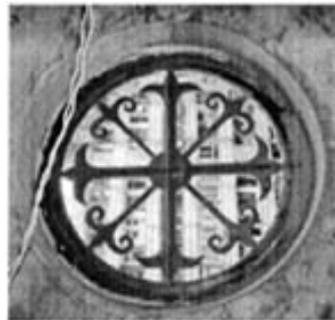


图 6.14: 钟楼木质圆窗

正立面上部中间部分，有两个连券柱式窗套，柱头

是科林斯柱式，券是尖券，线脚较复杂，窗套里面是尖券窗。窗正上方有一圆形假窗浮雕，圆凸出墙面，两层向内凹进，中间有花的雕刻图案。两边对称布置，墙面有曲线图案装饰。教堂屋顶采用的两坡瓦顶，屋檐的线脚较复杂，山墙正中有代表天主教的十字架。

教堂侧面被突出的半柱分成七段，每段中间有两扇连着的尖券窗，窗较瘦长，长宽比约为 4: 1，窗两层向内凹进，外面有尖券窗套。窗正上方有一圆窗，也是窗两层向内凹进，窗格呈发散状布置。尖券窗底边有线脚分割，屋顶的木构架外露，屋檐线脚较复杂。教堂背面祭坛屋顶用八边形攒尖顶代替，屋面檐口用斜撑出挑。墙面有尖券窗，窗外有尖券窗套。（图 6.15）



图 6.13.a: 文星街圣母堂外立面 1



图 6.13.b: 文星街圣母堂外立面 2



图 6.13.c: 文星街圣母堂入口



图 6.15: 文星街圣母堂侧立面

d. 内部空间和设施

从大门进去有一小的过渡低矮空间，进去是教堂的经堂。经堂入口处有夹层，夹层下面的柱子在中厅的位置增加了 3 根半径较小的柱子。经堂空间侧廊比大厅低，大厅和祭坛同一高度。经堂柱与柱间上部都是尖券拱。经堂大厅的 12 根是由整根的条石雕成的，现在这 12 根柱子已列为世纪保护文物。柱头是倒斗形，上面

有花草浮雕，柱身是圆形，柱基是扁圆石鼓形。石柱上游木主审到屋顶，形成骨架券，柱头下有垂花装饰。从经堂正立面的左侧入口内有楼梯可以进入经堂夹层，夹层与大厅同高，在侧廊相应的位置也由尖券门洞分为三部分（图 6.16）。在夹层上可以清楚地看见大厅（图 6.17）。入口正对着祭台，祭台平面呈半圆形其顶是半圆穹顶。其中的尖券拱式的槛内供奉着主保。从经堂正立面右侧的入口内有木楼梯可以上到钟楼顶部（图 6.18、6.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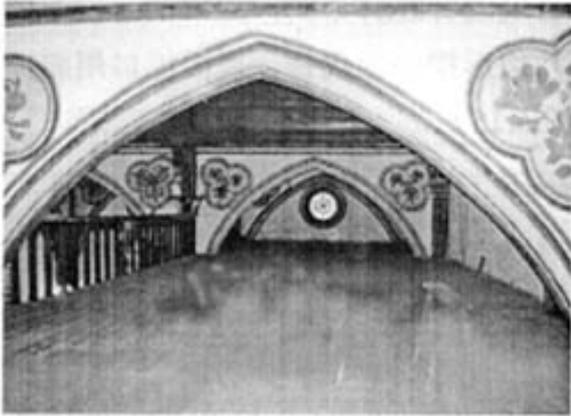


图 6.16: 经堂夹层风琴室



图 6.17: 从夹层上看经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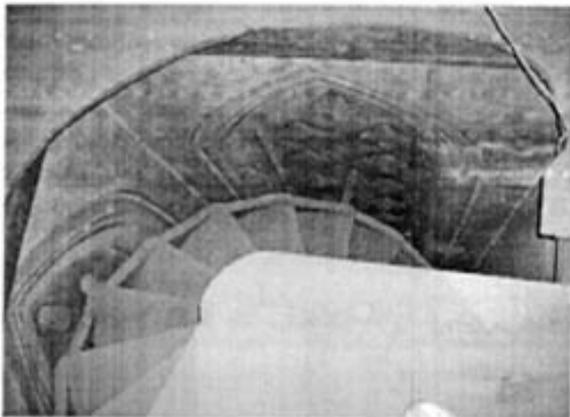


图 6.18: 通往钟楼的楼梯



图 6.19: 钟楼屋顶木结构

经堂内有较多花瓣浅浮雕（图 6.20.a、图 6.20.b），柱下有垂花装饰（图 6.21），门上有尖券浮雕装饰（图 6.22）。

教堂设施包括十字架、祭台、圣像、圣体栏杆、圣水池、告解房（忏悔室）、钟楼、管风琴、耶稣受难十四处油画等。教堂两侧的墙壁上悬挂有耶稣受难的全过程的四幅油画，圣坛墙壁上



图 6.20.a: 花瓣浮雕 1



图 6.20.b: 花瓣浮雕 2

方挂有圣母、圣父和耶稣的画像，都体现了其庄严、肃穆和神圣。



图 6.21: 垂花装饰



图 6.22: 门上浮雕装饰

6.3 安溪天主堂

6.3.1 安溪天主堂的由来和历史沿革

清咸丰十年（1860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四川设立叙府教区，派传教士来到自贡（当时自贡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富顺县），在我县境内传遍了各个角落。清光绪年间，富顺县建立了教堂，设了神父，脱离了自贡教会。教会直接隶属四川叙府教区，受郊区外国主教的管辖和支配。

在 100 多年前，宜宾教区（原叙府教区）法籍神父来富顺县铺子哟（今万哟乡）传教，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传至法籍蔡神父，将总堂迁至石灰溪（今安溪镇），修建了一所能容纳 300 余人的教堂，有田产 80 余石。随着教务发展，入教者达 2000 余人，教徒遍及安溪、万哟、长滩、童寺、赵化、琵琶、芝溪、起凤、古拂、大哟、毛桥、仰天、临溪等地。历经神父七届，其中有六人是法籍神父。1942 年以前，为法人孟思托主持。1942 年后，由国人欧君涛神父主持。

教堂和附属房间，总占地数千平方米。包括一个能容纳 300 余人的经堂；常有男女学生各 60 余人的男女生院和其他附属房间。在正街上教会还开办有修女诊所，同时还买荣昌县地处成渝公路中段。

教堂从解放后，先后作过区公所、乡政府、小学校、敬老院、中学等。直到 1987 年重新归还教会使用，又开放成为天主教堂。教堂由于解放后一段时间做过各种用途的建筑，建筑内部门窗等有一定的改变，但是建筑造型、结构等没有发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堂堂区大门上的“天主堂”三个字被铲除，1987 年，

富顺县文化馆馆长重新题字“天主堂”。1987年后，政府时有对教堂进行维修。今为县天主教爱国会所在地。

6.3.2 安溪天主堂的建筑风格及特点

a. 教堂建筑群体布局

富顺县安溪镇是一个很小的乡镇，整个镇只有一条大街，从大街的其中一条分支进去，远远的就可以看见山坡高处的教堂堂区大门。教堂建筑巧妙地结合了地形，建在较高的山坡上，这也符合教徒进行宗教活动时虔诚和崇敬的心情。教堂建筑布置随坡地延伸，从堂区的第一道门进去可以看见小路下面的男生院和高处的教堂堂区的第二道门。第二道堂区门建在居高临下的山头，显示出庄严、崇高、神圣的气势，产生一种宗教超越自然，以上帝为中心的视觉形象和宏大气魄（图 6.23）。

教堂建筑的整体布局属于中国传统院落式布局。教堂建筑群以堂区大门和经堂为中轴线。中轴线左边是教会学校的女生分院，右边是教会修女和传教士的住所。大门和经堂之间通过一个小厅过渡，大门、小厅和左右的附属房间围合成一个小的庭院，建筑比入口的花园高出一米。经堂和左右的附属房间又分别围合成左右两个半开敞的后花园。（附录 C）

b. 平面

安溪天主堂经堂的平面形制为早期基督教堂常用的巴西利卡式，没有外廊和突出的圣坛。（附录 B）

c. 立面及外观

教堂堂区大门正面由三部分组成。安溪天主堂的堂区门，是石牌坊样式，显得有些朴实无华。砖牌坊以砖墙为体，和中国传统砖牌坊不同的是，它没有坊脚，中间高、两边低的坊体，以青砖贴出三间四柱坊身，上加平顶板瓦顶，瓦顶角稍有起翘（图 6.24）。类似如：某教堂的大门（图 6.25）。两侧的附属房间的山墙，对称布置在大门两边。附属房间采用的两坡屋顶，屋脊突出，屋脊正中有“压胜”，“压胜”象葫芦的形状。附属房间的山墙中间有一腰檐挑出，是为了给腰檐下面的窗户遮雨。大门和山墙间由一上盖有瓦顶的片墙连接。经堂屋顶是硬山双坡顶，背立面山墙上有墀头（图 6.26，图 6.27）。

经堂和其他附属房间采用的当地民居形式，两坡顶房屋围合成的院落，房间外面有外廊，入口过厅屋脊正中有一十字架的“压胜”。附属房间有两层，下面挑空，结构是穿斗结构。（图 6.28、图 6.29）。



图 6.23: 从堂区门看教堂建筑



图 6.24: 教堂堂区门背面



图 6.25: 某天主教堂的大门



图 6.28: 教堂左侧后院附属房间



图 6.26: 经堂背面



图 6.27: 教堂前院附属房间

e. 内部空间和设施

从入口花园进去有一个小的过渡空间，再进入经堂。经堂有夹层，夹层是连通的。从入口过渡空间可以隐隐看见以前夹层的栏杆。楼梯分别位于左右后院落的小通道里面（图 6.30）。下面是天主教礼拜大厅，上面是给从远处来的教友住宿的地方。当时，每当复活节时候，会从周边的乡镇赶来许多教友，由于晚上有活动，他们只有在教堂留宿，上面的夹层没有隔断，教友是在里面打通铺休息。解放后教堂被其他单位占用时，已经将通往夹层的楼梯拆掉。

教堂的屋顶结构采用的中国传统抬梁木结构（图 6.31），从大厅里看见的屋顶即是夹层的楼板，夹层屋顶没有吊顶，可以直接看见屋顶的木结构。侧廊采用的斜吊顶，高的一端和中厅、祭台屋顶同一高度。柱子是杉木圆柱，柱子之间上部有镂空的木栏杆连接。墙壁以前是砖墙，柱子隐藏在墙内，砖墙被学校破坏后维修过。经堂的窗户原是尖券木窗，后来教堂重新维修也改为现在的长方形窗。

其他的附属房间屋顶也都是采用的中国传统穿斗木结构（图 6.32.a, 6.32.b, 6.32.c），现在里面大多也没有住人。



图 6.29: 教堂右侧后院附属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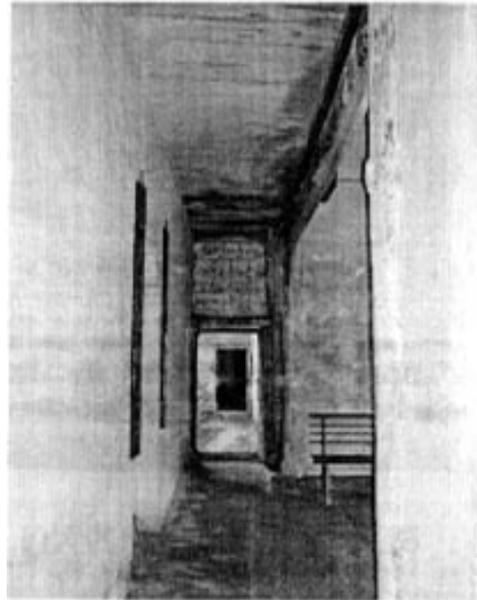


图 6.30: 通往楼梯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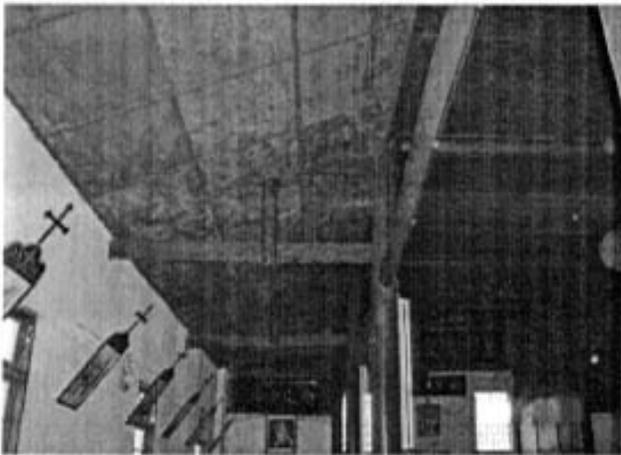


图 6.31: 经堂抬梁结构



图 6.32.a: 从经堂背面看经堂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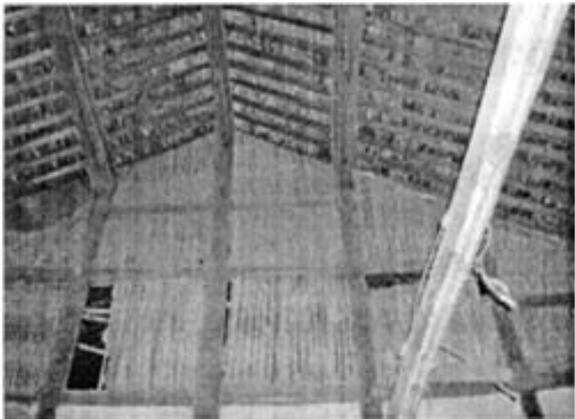


图 6.32.b: 教堂附属房间木结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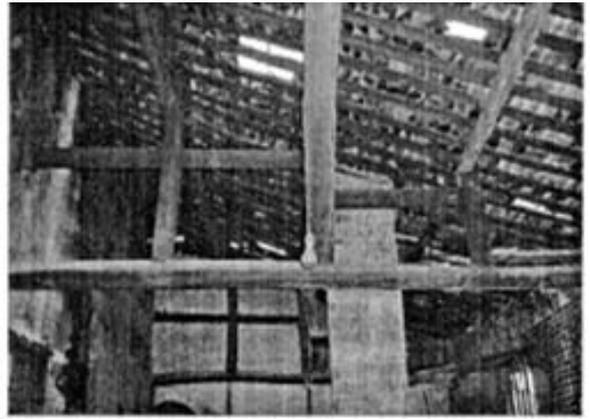


图 6.32.c: 教堂附属房间木结构 2

f. 建筑装饰和材料

安溪天主教堂的装饰较少，整体显得较朴素。外墙的木门窗有一些洛可可风格的涡卷、弧形装饰。

7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建筑成就

7.1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建筑特色

近代教堂建筑的兴建推动了建筑技术的交流和地方营建技术水平的提高。通常建筑技术是掌握在民间工匠手中，工匠的创意延续着古老的传统，他们会根据材料的性能与建筑功能的需要，采用一定的建筑材料，对材料进行加工改造、组合构筑，并在不断更新的基础上吸收和消化西方天主教堂的经验和作法，让中西建筑的构成要素根据自己在各自建筑体系中的位置，在教堂建筑的整体合成中各得其所。

7.1.1 建筑结构的选择

川南宜宾教区天主教堂作为近代宜宾教区出现的一种新型宗教建筑，会产生不同于传统建筑的功能需求。面对一系列出于教义要求而产生的新的平面、空间和形体，民间木构体系表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由于不同材料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结构选型，建筑的结构形式与材料性能要统一，西方教堂的空间结构需要在有限的物质条件约束下发挥作用。

教堂建筑通常以本地传统结构作为载体，选择砖木混用或石木结合，结构上仍然保持梁柱承重的木结构体系，尽材料最大限度满足建筑在高度和形式上的要求。为了适合西方教堂的空间功能，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在内部进行相似性的空间转换，常用的木结构形式是抬梁式，教堂内部的抬梁式构架营造中厅高而宽、侧廊低且窄的效果。教堂的附属房间多是穿斗式和抬梁式结合的木结构，适合不同功能空间的划分。

多数宜宾教区教堂采用六角、八角和圆形攒尖顶突出祭坛，而攒尖顶多用于传统园林中的观赏亭，用在教堂取其圆，以应天主教含义。

7.1.2 建筑材料的应用

宜宾教区天主教堂植根于乡土环境，需要根据环境所提供的创造条件和当地可以得到的建筑材料决定建筑形式，而选用的建筑材料除了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之外，地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也决定着建筑材料的喜好，教堂材料多采用砖、石、木。

7.1.3 受当地建筑工匠的影响和对当地传统技术的传承

教堂的建造,有的有外国传教士的图纸,工匠依照图施工,有的没有图纸,工匠仿造的。在建造的时候,当地建筑工匠根据传统法式设计大样并估工算料。一方面传教士在宜宾教区发展天主教,必须迁就和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无论是宗教教义编写,还是传教场所的建造,必然要适应当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其二,传教士出于对宗教的执着,严格遵循天主教教义,随时随地宣扬教义,地方工匠自然而然会吸取天主教所产生的情感和情绪。由于工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宗教教义的图解或形象化过程中,会偏离天主教的本意,有意无意地输入世俗的、带有地方情感的传统艺术。通过教堂建筑传达自己对宗教的感悟,他们不断完善教堂中不成熟的表现技艺,凭印象对西方装饰元素进行模仿,将惯用的传统艺术形式揉进教堂建筑,逐渐转化为新的艺术形式,使传统建筑方式在教堂中得以延续。

教堂建筑中有许多中西建筑矛盾的结点,同时也是中西建筑形式的融合点,如穿顶、柱之间的过渡形式是在中西之间往返交叉出现,相互渗透。民间传统文化灵活而可通融地吸收和适应外来文化,使当地的传统建筑技术在教堂建造中得到传承。

7.2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文化意义

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建筑,深刻而广泛地反映着人类的文化。建筑受到哲学、政治和美学以及当地民俗、民风和工艺技术、材料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是社会文化全方位的体现。建筑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性,保证了建筑始终忠实地扮演着历史赋予它的文化角色。

7.2.1 教堂与“西学东渐”

天主教堂作为西方的建筑传入我国,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建筑形式,也让当时的人们看到西方的东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建筑之所以能够立足,也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皇帝和皇室有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精通西方文化人才的需求。西方传教士们为了吸引中国人的目光得到皇室的认可推行学术传教的方针,努力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成就广泛传授,在不知不觉间成了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西学”的引入与发展已成为近代“实学”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对当时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西方传教士以“传播西方文化、发展中国文化事业”为名,在中国建立各种类型的学校,开办医院、育婴堂等所谓的慈善机构。

7.2.2 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来华传教士们不仅给中国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近代西方文明。同时他们在思想根深蒂固的古老国度里传教，必须熟知中国本土文化、尊重中国人的习俗、掌握中国语言，才能达到传教的目的。因此他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将中国传统的哲学、宗教、科学、艺术也介绍到了西方。即使是在中国极端落后的时期，中国的古老文化仍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西方传教士去探索、研究。

7.2.3 传教活动与殖民扩张

当然，回顾中国近代史，中西方的接触也充满了冲突与不公。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传教常常变成了殖民扩张的探路行为。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利用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加紧派遣人主教和传教士深入我国各地，为各国的侵略扩张搜集情报，寻找借口。加之传教士又经常强占土地、包揽诉讼、凌驾在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之上，因此捣毁教堂和冲击教士的事件时有发生。

但是，不管他们的初衷如何，许多人在有意无意间搭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人类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文化交流是一种多渠道、漫长积累的过程。中西文化通过传教士得以接触，两种文化在不断的碰撞、对抗、排斥、选择、改造过程中互为吸收、补充和交融。

7.3 小结

本章从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结构选型、材料应用、对当地传统建筑技术传承等几方面讨论了教堂建筑的建筑成就。教堂建筑在传入的同时，对当地文化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对西方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作为川南宜宾教区的建筑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文化价值。因为这些建筑是在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特色，而那种历史阶段在我国可能永远不会再现，它是独特的，应该对其进行保护。

一个城市给人的印象是通过多方面表现出来的，而建筑在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建筑给人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形态特征。如今，宜宾教区的宜宾、自贡、泸州等城市都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的大、中型城市，城市建设和美化景观方面有很大改善。但作为具有当地传统建筑形态特征的民居也随着城市开发与新建的步伐，正在逐渐消失。而教堂建筑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建筑类型留存至今，对一个城市来说，既能丰富城市景观，又能体现出独特的建筑文化。因

此，对这些教堂加以保护和修复，不仅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而且对建筑界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结 语

近代西方文化的进入,使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赖以保持稳定的基础受到冲击,刺激了近代中国建筑文化的形成及建筑形态的衍变,使西方教堂的移植深入到中国内地。欧洲教堂建筑的交流使传统建筑显现出影响和调整传统建筑文化结构的趋势与能力。鸦片战争后的天主教传播,造成中国文化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但中国文化毕竟源远流长,地域文化更是根深蒂固,其传统的历史惯性并非一日可变,这种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中西文化交流最终导致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变化的不稳定性。

本文对川南宜宾教区的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状况、分布特点、建筑造型风格特点和艺术成就作了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完成了一次建筑文化学和建筑史学的探索,并得出结论:

首先,宜宾教区的天主教堂建筑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它没有不完全体现其在欧陆本土的原初形态,而是因地制宜地融合了川南宜宾教区传统建筑的许多成分。

其次,新的建筑创造不局限于纯粹的欧洲古典建筑形式或材料技术的应用,更多地采用了当地的院落布局、木结构形式、地方材料和传统工艺,使之在新的环境中能够生存和发展。

因此,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充斥着西方宗教文化与川南传统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西建筑的拼接、教堂与民居的组合、天主教教义与当地民俗文化的交融、巴洛克式装饰与民间工匠技艺的巧妙结合,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宜宾教区天主教堂。

有多少种特定的环境条件和特定的人类个性,就会演绎出多少种物质的和文化的类型。它们使我们的世界历史地和现实地丰富起来,从而保存和延续了人类的文明,尽管其中包含着消极或是可批判可争议的成分。

致 谢

在论文完成之际，特别要感谢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和论文写作期间给予我指导与帮助的各位老师与同学。

首先,衷心感谢导师杨豪中教授，感谢他几年来对我专业上、工作中以及为人品德的严格要求和指导。他对文章的进度安排、组织结构、各部分的逻辑关系以及论文措辞等细微方面等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与建议，不仅帮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而且也使我在治学方法和钻研精神上均有了相应的提高，为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奠定踏实钻研、勤勉向上和严谨谦逊的作风基础。

其次，我要感谢张似赞教授，他在我的研究生学习阶段，给予了许多的学习、工作及生活的指导，张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积极的生活哲学都将深深影响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在论文的落脚点上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感谢各位评阅老师和答辩委员老师，谢谢他们的宝贵意见。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在我学习过程中给予我的关怀、照顾、鼓励和支持。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论文中一定存在不足之处。谨请各位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

参考书目

1. 德礼贤: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2. 杨真: 《基督教史纲》 北京三联书店, 1979
3. 黄心川: 《世界十大宗教》 上海东方出版社, 1996
4.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论丛》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4
5. 曹琦, 彭耀: 《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6. 徐宗译: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上海书店, 1990
7. 古洛东: 《圣教入川记》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53
8. 亚.泰纳谢著(美)《文化与宗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向楚等纂
9. 威利斯顿. 尔克(美)《基督教全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 埃德温. 希斯科特著(英)《教堂建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 瞿晓高译
11. 李先述: 《古代巴蜀建筑的文化品格》 建筑学报, 1995
12. 张复合主编: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一)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13. 张复合主编: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14. 杨秉德, 蔡萌: 《中国近代建筑史话》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15. 杨秉德: 《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融史》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6. 杨秉德: 《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 建工出版社, 1993
17. 王小朝: 《宗教学基础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8. 刘先觉: 《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9. 四川省地方志委编委员会: 《四川省志. 建筑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 李熙亭: 《四川天主教史料汇编》 内部资料, 1985
21. 柳肃: 《评述本世纪中国建筑中的三次复古风潮》 中外建筑, NO.3, 1997
22. 汪坦主编: 《第一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8
23. 汪坦主编: 《第三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3
24. 杨崇林: 《中国近代建筑的形成和发展》 四川建筑 NO.2, 1995
25. 杨崇林: 《小教堂与文化侵略》 四川建筑 NO.5, 1994
26.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us》 Donbleda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27. Linda Cooke Johnson: 《Cities of Jiangnan in Imperial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8. Catholic.Information.Links

<http://www.cathlinks.org>

29. 《Catholic-wilib》

<http://www.ccccn.org>

30. Mumford.L: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38

图表来源

- 图 1.1: 课题研究组织结构图, 资料来源: 自绘
- 表 2.1: 1875-1910 年川南教区传教士和天主教徒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 根据《川南主教区基督教徒行改篇统计表》自绘
- 表 2.2: 川南教案统计统计表, 资料来源: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外事志, 自绘
- 图 3.1: 四川省天主教堂分布图, 资料来源: 《圣殿风貌》
- 表 3.2: 现存的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 资料来源: 自绘
- 图 3.3: 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的分布现状, 资料来源: 根据 www.guang.net 四川地图自绘
- 图 4.1: 宜宾文星街圣母堂,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4.2: 双河天主堂,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4.3: 宜宾拱星街圣体堂,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4.4: 陆军部衙署主楼立面, 资料来源: 《巴洛克对近代中国建筑的影响》
- 图 4.5: 安溪天主堂,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4.6: 江安天主堂,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4.7: 泸州真原堂,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4.8: 纳溪天主堂,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5.1: 巴西利卡式平面,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5.2.: 泸州真原堂撑弓作法 1,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5.3: 泸州真原堂撑弓作法 2,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5.4: 泸州真原堂作法 3,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5.5: 安溪天主堂出挑作法,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5.6: 江安天主堂出挑作法 1,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5.7: 江安天主堂出挑作法 2,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5.8: 江安天主堂屋脊“压胜”,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5.9: 拱星街圣体堂屋脊“压胜”,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5.10: 泸州市真原堂屋脊“压胜”,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5.11: 拱星街圣体堂屋角,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5.12: 文星街圣母堂祭坛外立面,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5.13: 拱星街圣体堂祭坛屋顶, 资料来源: 自摄

- | | |
|-----------------------|----------|
| 图 5.14: 江安天主堂祭坛外立面,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15: 双河天主堂祭坛外立面,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16: 江安天主堂墙面做法,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17: 拱星街圣体堂祭坛,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18: 文星街圣母堂祭坛,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19: 纳溪天主堂祭坛,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20: 双河天主堂祭坛,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21: 泸州市真原堂祭坛,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22: 安溪天主堂祭坛,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23: 安溪天主堂经堂,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24: 双河天主堂经堂,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25: 纳溪天主堂经堂,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26: 江安天主堂经堂,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27: 文星街圣母堂经堂,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28: 拱星街圣体堂经堂,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29: 文星街圣母堂柱头 1,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30: 文星街圣母堂柱头 2,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31: 拱星街圣体堂柱头,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32: 泸州市真原堂柱基,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33: 江安天主堂柱基,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34: 拱星街圣体堂立面窗,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35: 文星街圣母堂立面窗 1,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36: 文星街圣母堂立面窗 2,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37: 双河天主堂立面窗 1,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38: 双河天主堂立面窗 2,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39: 安溪天主堂立面窗,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40: 纳溪天主堂立面窗 1,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41: 纳溪天主堂立面窗 2,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42: 泸州市真原堂经堂门,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43: 江安天主堂窗,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44.a: 泸州市真原堂雕花 1,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44.b: 泸州市真原堂雕花 2,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44.c: 泸州市真原堂雕花 3,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45.: 泸州市真原堂雕花,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5.46: 双河天主堂墙壁浮雕, | 资料来源: 自摄 |

- | | |
|-------------------------|----------|
| 图 6.2.a: 拱星街圣体堂正立面入口 1,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1: 拱星街圣体堂正立面,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3a: 正立面入口柱子 1,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3b: 正立面入口柱子 2,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2.b: 拱星街圣体堂正立面入口 2,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4: 拱星街圣体堂立面山墙,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5: 拱星街圣体堂侧立面,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6: 拱星街圣体堂屋脊“压胜”,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7: 神父住所,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8: 神父住所二楼走廊,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9.a: 从祭坛向大门方向看,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9.b: 从大门向祭坛方向,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10: 经堂侧廊,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11: 经堂柱子单元,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12: 圣水石容器,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13.a: 文星街圣母堂外立面 1,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13.b: 文星街圣母堂外立面 2,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13.c: 文星街圣母堂入口,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14: 钟楼木质圆窗,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15: 文星街圣母堂侧立面,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16: 经堂夹层风琴室,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17: 从夹层上看经堂,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18: 通往钟楼的楼梯,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19: 钟楼屋顶木结构,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20.a: 花瓣浮雕 1,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20.b: 花瓣浮雕 2 ,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21: 垂花装饰,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22: 门上浮雕装饰,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23: 从堂区门看教堂建筑,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24: 教堂堂区门背面,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25: 某天主教堂的大门,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28: 教堂左侧后院附属房间,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26: 经堂背面,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27: 教堂前院附属房间, | 资料来源: 自摄 |
| 图 6.29: 教堂右侧后院附属房间, | 资料来源: 自摄 |

图 6.30: 通往楼梯的通道,

资料来源: 自摄

图 6.31: 经堂抬梁结构,

资料来源: 自摄

图 6.32.a: 从经堂背面看经堂结构,

资料来源: 自摄

图 6.32.b: 教堂附属房间木结构 1,

资料来源: 自摄

图 6.32.c: 教堂附属房间木结构 2,

资料来源: 自摄

附录

附录 A

图表 1: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平面形式

——巴西利卡（有凸出祭坛）

<p>文星街圣母堂</p>	<p>江安天主堂</p>	<p>双河天主堂</p>
<p>泸州市真原堂</p>	<p>拱星街圣体堂</p>	

附录 B

图表 2: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平面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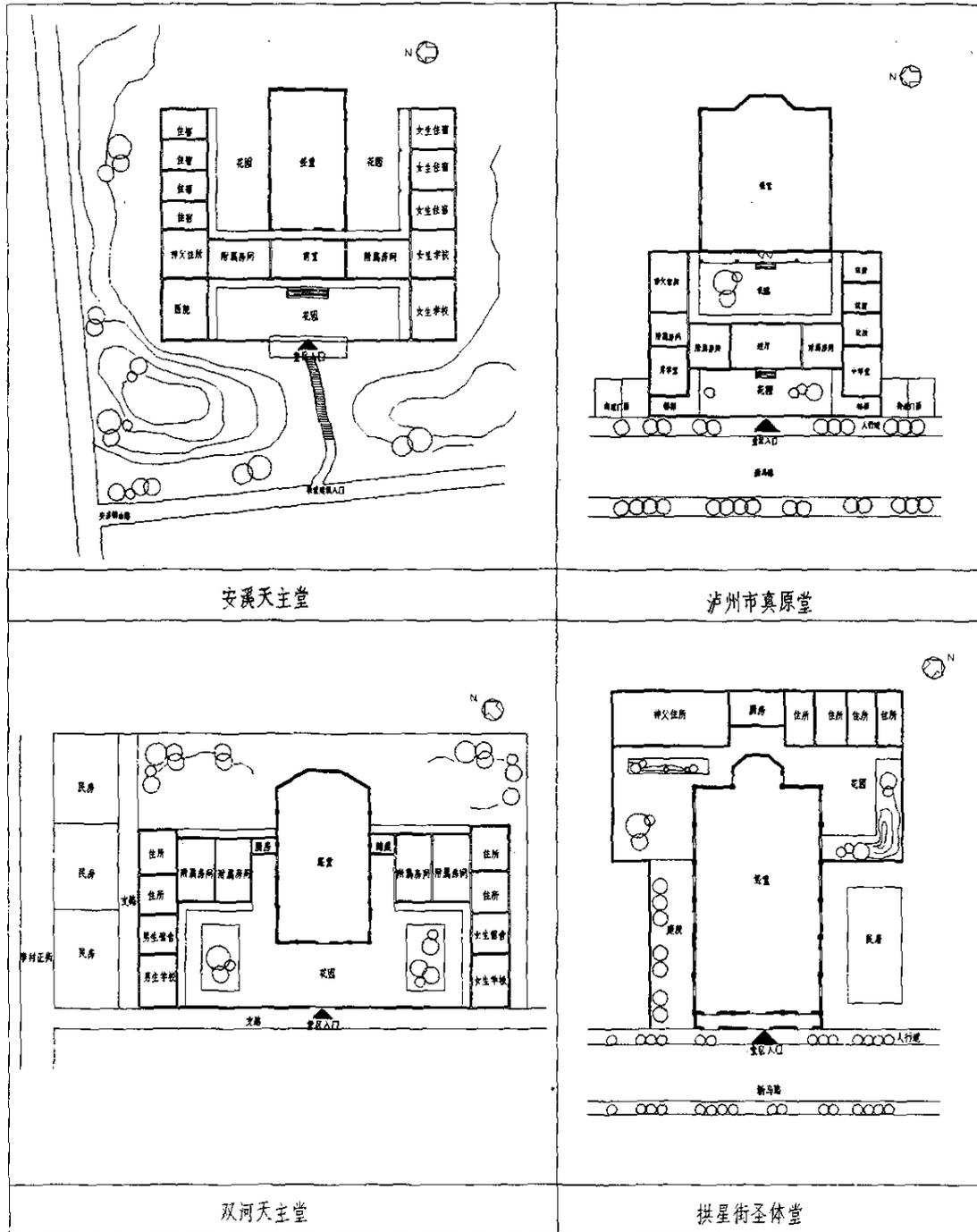
——巴西利卡（没有凸出祭坛）

<p>纳溪天主堂</p>	<p>安溪天主堂</p>	

附录 C

图表 3: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群总体布置

——经堂位于教堂建筑中轴线上



附录 D

图表 4: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群总体布置

——经堂偏于教堂建筑中轴线

